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谁敢横刀立马

第四册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谢良率部过雪山

红五军团过了泸定桥经过天全，于 1935 年 6 月到达川西的宝兴县，根据军团的命令，红 37 团在宝兴以北 50 里的盐井坪，构筑工事阻止尾追之敌。

村子里冷冷清清，鸡不鸣，狗不叫，很少有人走动，遇上的几个老人、小孩，也都离得远远的，用惊惧的目光看着红军战士；而那瓦房，漆黑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一打听，是家地主，可人早已逃走了。

部队住下以后，一面在村外构筑工事，一面在村里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战士们帮助老乡扫院、劈柴、担水；团政治处的同志又把地主的粮食衣物拿出来，分给贫苦的农民。很快，老乡们认识到红军和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不一样，真正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便和战士们亲近了。

红 37 团到盐井坪以后不几天，全军的大队人马络绎不绝地经过这里，向夹金山方向前进。战士们站在阵首，眼看着浩浩荡荡向北开去的队伍，红旗招展，军号嘹亮，战马嘶鸣，显示出中央红军的坚强实力，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然而，乡亲们听说红军要翻到雪山那边去，很多人都惊愕地摇着头说：

“哪怎么行？雪山是过不得的。”

他们把雪山形容得非常可怕，说雪山是“神山”，山上冰天雪地，鸟兽绝迹，一会儿狂风大作，一会儿大雪纷飞，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会被狂风卷去。有的老年人更是劝阻说：

“常言道，大雪山，大雪山，只见有人上山走，不见有人下山来。你们千万不能上去啊！”

“为了北上抗日，为了天下穷人的解放，莫说是雪山，就是刀山，也要过呀！”红军战士向乡亲们解释说。

这时，一个 27 岁的小伙子笑着，轻松地说：

“其实，雪山没啥了不起，能过去。”

“啊，是你！”侦察排长王志雄一看，这个小伙子原来是他们排的一家房东，平时以打猎为生，兼种地主的几亩地。红军队伍刚来的那阵儿，他整天不说一句话，如今看到红军处处为穷百姓着想，帮助老乡们打土豪，闹翻身，终于开了口。王排长上前握住他粗大的手，高兴地问道：

“你翻过雪山吗？”

“翻过！”

“到时候，你能带我们过去吗？”

他点点头，说：

“行，我给你们带路。说实在的，你们图的啥呀，还不是为了所有的穷人都解放。再说，你们来了给乡亲们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不送你们过去，心里也过意不去呀！”

后来，依照这个小伙子的建议，买了许多辣椒、大蒜、大葱，准备完成阻击任务后上山时吃，以抵御雪山上的寒气。

中央红军从盐井坪这个深山谷整整过了两天，第三天一大早，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混成第 1 旅跟踪而来，他们遇上了红 37 团的坚决阻击，龟缩在离红军 1 里多的地方构筑工事。从此，敌我双方白天互相射击，夜晚各自修筑工事，彼此对峙着。

大约是战斗到第五天，红 37 团接到军团首长打来的电报，在夹金山那

边，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已胜利会师。37 团已经完成掩护任务，应立即北上。

战士们听到这一消息，个个兴高采烈，都说：

“翻过大雪山，我们也能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了！”天不亮，部队就从盐井坪出发了。经过 70 余里的行军，赶到夹金山下，部队就地宿营。炊事班的同志忙着给大家做饭，可水老是烧不开，大家既奇怪又着急。团卫生队长谢立泉是个知识分子，说：

“这里地形高，缺少氧气，所以水就烧不开，只好凑合些，半生半熟的吃一顿吧！”

大家解除了疑虑，只好将就些吃一点。

次日清晨，战士们很早就起来了。团政委谢良走出帐篷抬头向山顶望去，只见大山白皑皑的一片，积雪在朝阳照射下，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夹金山的主峰，像一把锃亮的利剑，直插云霄，向青天刺去。

团政委谢良和团长李屏仁同志跟向导走在队伍的前头。一路上，向导指东指西，讲一些关于雪山的情况。他说，平时是没有人敢上山的，只有夏天，少数为了赚钱不要命的商人，才用牲口驮着花布、茶叶、盐巴……进山至藏族地区出售，返回时再驮上狐皮、鹿茸、麝香等贵重物品，只要不冻死在山上，回来一卖，便大发横财。他还说，在山顶附近，有一很小的喇嘛庙，每个上山的人，几乎都要向它许愿，祈求佛爷保佑，而后才过山。

听到这里，李屏仁开玩笑说：

“我们也要许愿吗？”

向导笑笑，说：

“你们大军都是神兵神将，用不着许愿！”

“哈哈！神兵神将，那我就是真人铁拐李啰！”李屏仁同志挥着手中的拐棍，笑了起来。

在大雪上行军，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大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

战士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有的把毯子裹在身上，也无济于事，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颤。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战士的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谢良问一个战士疼不疼，他说：“起初还有点疼，现在麻木了，也不觉得疼了。”

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由于严重缺氧，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昏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李屏仁的腿负过伤，平地行军都有些拐，如今爬山更是困难了，但他顽强地坚持着，拄着根木棍，一步一喘，一颠一颠地跟着大家往上爬。谢良见他脸色苍白，便问道：

“老李，怎么样，找两个同志扶你走吧？”

“不要。”李屏仁团长赶紧举起手里的木棍，装出很轻松的样子，说：“你看，我有 3 条腿哩！”

可是话音刚落，他脚下一滑，就跌了一跤。战士们连忙把他拉起来，他还挣扎着自己走，然而通信排的两个战士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扶着，把他架走了。

快接近山顶了，山势更加险峻。风大，路滑，经常有人跌倒，甚至从雪

坡上滚下去。不少人已精疲力竭，走几步就呼呼直喘，只想坐下歇一歇。有的说：“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让我坐一会儿吧！”但是一坐下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况，旁边的同志总是温和而又严肃地说：

“不能坐，来，我扶着你，慢慢走。”

团宣传队的几个队员仍然很活跃，支撑着疲乏的身子，用嘶哑的声音不断地喊着鼓动口号：

“同志们，加油！快到山顶了！”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

在路的两旁，可以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那是前面的部队过雪山时牺牲的指战员，使大家感到十分沉痛，同时又使人警惕起来，仿佛那些牺牲的战友在告诫说：可不能松劲呀，一松劲就起不来了！一定要拿出身上所有的力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

部队坚持着，整整走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终于登上了山顶，高高的大雪山被踩在脚下了！

一股豪情情不自禁地在谢良的胸中溢起，战士们也都欢呼起来。

欢呼声响彻冰山雪岭，在山谷间久久地回荡着。

谢良和李屏仁并肩站着，举目远眺，只见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四周冰峰壁立，雪山环抱，山谷间云海连绵，恰似波涛汹涌，真像到了神话中的琼宫玉宇的世界。

“啊！好看极啦！”谢良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李屏仁天生是个乐天派，身上总是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这时，他笑着说：

“这里奇妙的风光，只有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战士，才能欣赏啊！现在的武汉、南京，热得像个大火炉，人们吃着西瓜还出汗呢！”

在山顶走 1 里多，经过那座颓败的小喇嘛庙，就开始下山了。又走了五六里，积雪逐渐少了，山坡上沟壑纵横，矮树丛生，一群群浑身长着长毛的牛，有的低头吃草，有的追逐嬉戏，许多战士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家伙？”向导告诉大家：“这就是藏民的牦牛。”

下山以后，37 团按照军团部早先的指示，顺着河沟，到达维南边的一个村庄去宿营。战士们边走边回头看着背后的大雪山，喜笑颜开地说：

“再见啦，夹金山！”

傍晚，透过高原上的矮树林，在苍茫的暮色中，可以看到一座很大的村庄。

“到宿营地了！”大家都感到松了口气。

正要进村，只见村头上歇着一匹战马，军团部的一个骑兵通信员已在等待 37 团。他见了李屏仁和谢良，立即拿出军团首长的一封信来。李屏仁一边拆信，一边笑着说：

“首长准是叫我们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好跟着全军继续前进！”

“也可能要我们整顿军容，准备和四方面军会合。”谢良也高兴地估计着。

打开信一看，情况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信中说：奉军委电令，为了保卫党中央，掩护一、四方面军休整，你们接到信后，迅速越过夹金山，

再至盐井坪一线坚守阵地，继续阻击尾随的敌人。

这一任务来得太突然了！李屏仁和谢良都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处置。

部队好容易才越过雪山，现在马上又要返回去，大家的思想能不能搞得通呢？但是，这是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能够充裕休整以便北上抗日啊！李屏仁、谢良相信，只要把任务的重大意义讲清楚，广大指战员是会排除万难，去坚决完成的。

第二天拂晓，在“再过夹金山，守住盐井坪”的响亮口号下，部队又一次向雪山进军。

行军的速度很快，上午八九点钟，部队就登上了山。这时候，山上弥漫着浓重的云雾，这些浓雾，就像变戏法似的，忽儿变成牛毛细雨，忽儿又变成鹅毛雪片，大家的衣服、帽子全部给打湿了，寒风一吹，立刻结上了一层薄冰。

“冷吗？”谢良问一个小战士。

“心里是热的。”他简短地回答。

“好！快走！”谢良为有这样的好战士而心情激动。

部队下山时，又遇到了难题。道路本来曲折陡峭，加上雾气降在雪上又冻了一层冰，变得更加光滑难行。许多人稍一疏忽，便跌了个仰面朝天。有的同志口口声声叫别人小心，自己也滚倒在雪地上了。队伍的前前后后，不时地传来滑倒跌跤的声音。

行军速度明显地减慢了。李屏仁看到这情形，拄着棍子焦急地说：

“这怎么行，到天黑也下不了山呀！”

2 营的饶子健，正要说什么，突然脚下一滑，刺溜一声，一下子滑下去十几丈远。大家正为他担心，他却慢慢地站起来，抬起头向大家看了看，高声嚷道：

“溜吧！溜着下来快呀！”

他这一喊，提醒了大家，几个战士马上把枪抱在怀里，往下一坐，嗤地滑下去了。

于是，大家都用滑雪的办法下山。垫着斗笠的，垫着毯子的，或者就垫一双草鞋的，坐着的，蹲着的，各种姿态都有，滑呀，滑呀，一齐向山下滑去。有些人互相撞上了，翻滚在雪地里，哈哈大笑着把对方搀扶起来，又继续往下滑。有的人耳朵冻疼了，手冻僵了，呵呵气，搓一搓，又鼓足勇气滑起来。

白茫茫的雪山上，数不清的黑点，流星似地向下滑去，格外显眼，好像从雪山顶上，突然泻下一股湍急的人的瀑布！真是飞兵自天而降，锐不可当啊！

两个多小时，部队就来到山脚下，或者说是滑到了山脚下。许多人滚得从头到脚都是雪，有的衣服扯破了，有的脸颊跌肿了，大家互相一看，不禁大笑起来。

李屏仁、谢良通知各连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检查、擦拭武器，吃点干粮，准备继续前进，迎接新的战斗。

部队在山脚下稍微休息一会儿，就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插盐井坪。一路没有停留，翻过一座座山岗，穿过一条条峡谷，天黑时，盐井坪的灯光已隐约可见了。侦察排长王志雄迎上前来，报告说：

“咱们走后，据说敌人怕红军有埋伏，一直没有敢上来，现在阵地还空

着呢！”

这一意外情况，使部队前进的速度更加快了，大家决心先敌占领空着的阵地。

在盐井坪，红 37 团又开始了和敌人的对峙，白天打仗，黑夜休战。敌人不进攻，红军也不出击，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红 37 团没有任何伤亡。

一天下午，李屏仁拿着一份电报，兴冲冲地走来，连声说：

“好消息！好消息！”

谢良接过电报一看，内容是：最近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了会议。会议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电报并指示 37 团：

你团接此电后，应立即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

从第一次过雪山那天算起，正好是整整 10 天，现在又要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了。那个向导又跑来要求仍让他带路。李屏仁说：

“我们已走了两趟，路熟了，你不必再过去了。”

可是他却说：

“雪山的天气是孩子脸，一天十八变！说不定会遇上大风雪，你们要迷路的。”

谢良很感激他的好意，便说：

“那我们三过雪山，你不要过四次吗？”

他却笑笑说：

“不，我也只过三次，我要参加红军！”

李屏仁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十分动情地说：

“好哇！我们欢迎！”

红 37 团仍顺着前两次的路线走，在山脚下宿营。第二天一早，部队就上山了，由于有前两次的经验，大家走得不紧不慢，感到比第一次轻快得多。但是，离山顶不远时，山后突然涌出一块乌云，向导瞅了瞅，神情紧张地说：

“糟了！要来暴风雪了！”

“真的吗？”李屏仁赶紧问道。

“错不了，你看这块乌云。”向导十分肯定地回答。

谢良抬头一望，只见乌云正在迅速扩大，看来向导的话不差，于是，立即通知部队，做好抵抗暴风雪的准备。有的战士却不大相信，满不在意地说：

“谁开玩笑吧？这么大的太阳，一丝丝风也没有，怎么会有暴风雪呢？”

可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愿不愿意，这块乌云仍在逐渐扩大，顷刻盖住了半边天。

天昏了，地暗了，雪山也改变了刚才的容貌，变得阴森可怕。

突然，山间长啸一声，呜呜的狂风猛地向大家扑来，好多人背上的斗笠，被吹到半天空，又落到几十丈的雪沟里去了。

不一会儿，狂风卷着暴雪，铺天盖地压来。整个雪山，呼啸着，咆哮着，如千军呐喊，万马奔腾。人往前走，狂风像只无形的巨手把人们挡住；稍抬起头，雪粒便刷刷地迎面射来。有的同志大声叫道：

“我迈不开步子啦！”

“拉住！大家紧紧拉住！”同志们互相鼓励着。

战士们五六个人，挽着手，弓着腰，互相拉着、推着、顶着，慢慢地向前移动。

可是，一遇到凶猛的旋风，又走不动了。为了防止被旋风卷走，大家想了一个办法，五六个人结成一个蘑菇形的人环，低着头，蹲在地上不动。一路上，大家就采用这种方式抵抗一阵又一阵的旋风。

在这千年不化的雪山上，无数个蘑菇形的人环，像一朵朵迎着暴风雪开放的雪莲，闪耀着群众的智慧，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尽管这样，有的人还是倒下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屈服，英勇顽强地同雪山上的风暴搏斗着！

部队登上山顶的时候，暴风雪好像被红军战士顽强的意志镇住了，逐渐减弱了。但每个人都已精疲力竭，要不是互相搀扶，准会有更多的人倒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突然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惊呼。谢良抬头一看，前面路旁围着一堆人。谢良心想不好，急忙赶上前去，只见 1 连炊事班长老刘脸色苍白，躺在雪地上，已经不省人事了。

“赶快叫医生来！”谢良对站在老刘身旁的 1 连指导员说。

“去叫了。”指导员对谢良说：“哎！真想不到，刚才还好好的，起暴风雪那阵，别人要挑他的担子，他还不愿意。快到山顶时，他就气喘得不行，一到山顶就坐下，坐下后就躺倒昏迷不醒，再也起不来了……”

医生赶来，经过一番抢救，又痛心地摇摇头。1 连指导员俯下身子，大声叫道：“老刘！老刘！”开始老刘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才微微睁开两眼，牵动了一下嘴唇，小声说道：“指导员，我对不起党，没有能够坚持……”

“老刘，不要紧的，你会好的！”谢良安慰他说。

他强睁着眼，转向谢良，说：

“政委，我……不行了，过不去了。”

突然，他一只手颤抖着伸进口袋，拿出一个手绢包，塞到指导员的手里，而后微微一笑，断断续续地说：

“同志们，跟着毛主席前进，北上抗日！”

说完，老刘就紧闭了双眼。虽然同志们大声呼喊，他却再也不吱声了。

手绢被打开了。里面有两张用旧了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钞票和 1 块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两行模糊的、但却十分工整的铅笔字：

“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谢良接过这个还留着老班长体温的手绢包，像是接着一团火，一阵心酸，泪水便止不住淌下来，模糊了双眼。

谢良知道，这样的纸条，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很多党员身上都有。谢良也曾好几次从牺牲的战友身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但谢良没有想到，老刘竟把它保存得这样长久，而在这长征途中，在雪山的狂风暴雪中交出了它！

谢良双手捧着这个小小的手绢包，觉得手里捧的不是普通的两张钞票和 1 块银元，而是捧着老刘的一颗心，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啊！

暴风雪已经过去，云层间射出了金色的阳光，雪山变得异常肃穆庄严，好像也在为老刘的牺牲表示哀悼！

队伍不断地从谢良他们身旁走过，不时听到悲哀的叹息：

“老班长牺牲了！”“是老刘同志，老刘牺牲了！”

“呜呜呜……”一直站在老班长身旁的一个年轻炊事员，突然失声痛哭

起来，好几个战士也接着抹起了眼泪。

老刘却一动不动地躺着，消瘦的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像是熟睡了一般。

当晚，部队在达维宿营。第二天休息一天，又向懋功进发了。

长征中的一个炊事班

这个故事是根据谢方祠的《九个炊事员》一文改写的，其中的人物由于年深日久，不知其名，甚至忘其姓了，然而他们的思想境界，言行举止，却至今教人永志不忘，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长征的时候，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里的炊事班中有 9 名炊事人员，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心血和生命，谱写了动人的史诗，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炊事班长姓钱，面皮黝黑，个子不高却很结实，平时不大言语，干起活来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江西吉安人。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爱说爱笑，江西兴国人。挑水的老王，为人忠厚老实，江西吉安人。其余几个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个个争强好胜，从不给自己的集体抹黑，总是为它增光添彩。

那时候，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他们每人只准挑 40 斤，可是他们都打埋伏，把粮食藏在饭锅里，打进背包里，每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时，他们还提意见，说连里领导和司务长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排里的战士，万一途中征集不到或买不到粮食，人生地疏，部队吃什么？因此，他们为连队着想，为胜利打算，总是千方百计地多挑些粮食。领导上明知如此，也不好制止。

行军途中，炊事班锅碰碗，刀碰盆，叮当作响，好不热闹。副班长老刘有时还讲个笑话，唱支山歌，逗得大家前俯后仰，捧腹大笑。全连战士一见到他们就喊：“瞧，咱们的戏班子来了，可以随时随地登台演出。”有时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呼哨飞奔，似乎六七十斤重的担子不在自己的肩上一样。

可是，有点军事生活的人都知道，炊事员的工作是最繁重、最辛苦的，尤其是行军打仗时更不消说。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拾柴烧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放下担子又安锅灶，又劈柴，又做饭，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又忙着起床做饭。

部队进入广西后，山区地瘠民贫，人烟稀少，粮食供应困难。炊事人员经常要翻山越岭，到前面去买稻谷。稻谷还要碾掉皮，为此他们还专门买了个小石磨。这样，他们又增加了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一个旧簸箕，便又多了两件家当。从此，“戏班子”成了“小磨坊”。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东南山阻击敌人，这个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往前沿阵地送饭都未成功。战友们打了一天一夜仗没吃上一口饭，炊事班副班长急得围着锅台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合计了一阵，对司务长谢方祠说：“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说着他把饭背在身上，同老王一起走了。站在山头的司务长看着他们，只见他们一前一后，飞快地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跑过去。可是，敌人的机枪发疯似地吼叫起来，老王一个跟斗栽倒在地，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了下去。同志们以为他俩牺牲了，心中十分难过。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说：“我们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可他手下一些人不让我们进门，说我俩还不够格！”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跌倒的。靠他们的机智勇敢，到底把饭菜送上了阵地。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但他还是挑着 70 多斤重的担子，拄根棍子跟着部队行军。开始，他的眼睛还只是流泪，慢慢流起血水来，可他总是闲不住。

爬雪山之前，上级通知连队轻装。他们不得不把一些炊事用具甩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了一些辣子、生姜和 10 多斤柴火。

雪山很高，一座雪山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休息，可是一坐下来靠自己的力量就很难再站起来。炊事员便赶紧上前去喂生姜，灌辣椒水，把战友拉起来。这时，炊事员又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这口号只是反映了红军战士的决心和友谊，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就在抢救战友时，有两个炊事员却被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生命。

到了毛儿盖，休整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 10 天干粮，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司务长建议，要烧热水给战士们烫脚。司务长怕他们太辛苦没有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点，他们就把水烧好了。他们烧水用的燃料，是他们从草地上捡来的牛粪。全连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赞扬炊事班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

情况越来越严重，部队断粮了，只得靠野草充饥了。有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锅行军，忽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一声不响地就牺牲了。另外一个炊事员铁青的脸上流着眼泪，拾起铜锅挑起来又继续前进。

草地的天气和环境极坏，时阴时雨时风时晴，地面上连一块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也难以找到。风雨大了，部队停下来休息，炊事班赶快支起锅，烧姜汤、辣椒水给战士驱寒。姜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友手里送，刚把碗递给战友，便一头栽倒在地，停止了呼吸。

第五天晚上宿营时，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炊事班长听说后找到连长说：“连长，绝不能在连里抽人给我们，那会影响战斗力。牺牲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一下，觉得这话有道理，就放弃了这个打算。那时，长征开始时 100 多人的连队，只剩 30 多人了。

这天刚交后半夜，班长老钱带病偷偷地为战友们烧开水，突然身子一斜倒在地上不动了。司务长伏在他身上叫着，喊着，可任凭怎么呼唤，老钱紧闭的双眼再也没有睁开。灶膛里火光熊熊，把老钱蜡黄的脸映得通红。人固有一死，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就义于刑场，有的死于病床，而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他也是为革命而死，是死得其所的。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照常有开水喝，有洗脚水用。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口铜锅转到了司务长谢方祠的肩上。因为，这时炊事班的 9 位同志全部为革命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朋友，这个故事虽小，可它是多么悲壮而又惨烈的一幕呀！

贺龙留用败军之将

1934 年 10 月，红二、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任书记，贺龙等任委员，同时组成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治委员。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两军团行动。

两军会师，秣马厉兵，战斗力增强，接连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战斗的

胜利，消灭了敌人六路“围剿”部队中的一路，破坏了敌人的进攻部署，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以贺龙为首的军分会总结了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加深了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理解，根据敌情，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展开新的作战行动。

1935 年 6 月 9 日，红二、红六军团以一部兵力深入国民党鄂军防区纵深内包围了宣恩县城，以另一部兵力切断了宣恩、恩施间的交通，歼灭了部分敌人，主力则隐蔽在宣恩城南 10 公里处，准备打敌援军。此部署，矛头对准了红军的老对头张振汉。张振汉在南昌起义时曾是贺龙的部下，后来投向国民党。从洪湖苏区起就参加围攻红军，几年来一直同红军纠缠，现任纵队司令兼第 41 师师长。此人虽谨慎，可有时却很狂妄，此时常在上峰和部属面前夸下海口，一定要活捉贺龙！

湖北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怕宣恩有失，急令张振汉率部从来凤、李家河驰援。6 月 12 日，张振汉以第 48 师 1 个旅又 2 个团为右支队；第 41 师 1 个旅为中支队；以第 41 师师部率 1 个旅为左支队，经忠堡，开往宣恩。他计划于当日下午将 3 路支队集中于忠堡，再全力援救宣恩。谁知，此计划在他出动的前夜，已被红军获悉。贺龙决心将敌人消灭于运动中，并要活捉张振汉。他当即命令 1 个团佯攻宣恩，主力连夜急行军开赴忠堡。红军先头部队马不停蹄地赶了 65 公里崎岖难行的山路，到达忠堡附近时，敌右支队已抢先进入忠堡，中路和左支队离忠堡也很近了。

红军侦察员向贺龙报告：张振汉的队伍正向忠堡前进。贺龙当即命令部队：敌人不到近前不准开枪；打的时候要狠，要猛，绝不能让敌人跑掉；没有打响时要隐蔽好。

敌人正以行军队形向前开进，突然遭到红军猛烈打击，措手不及，右支队后卫被歼灭，左支队先头部队被击溃，大部被压在山谷内。此时，各路红军相继赶到，切断了敌军各路的联系，并占据了有利地形，扼住了可能由忠堡出援敌军的道路。被围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贺龙、任弼时爬上山顶，用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任弼时看到被歼部队战斗力不强，估计张振汉不在此部队之中。贺龙说：“我也这样想。我们一定要把张振汉请进来。”这时，几个战士押着一个俘虏上来了。贺龙向这个军官打扮的俘虏了解情况。俘虏说：他是第 41 师的，师长张振汉和师部还在后面。贺龙、任弼时立即把此情况派人告诉参谋长李达和红 4 师、红 6 师师长，叮嘱说：“要引张振汉进口袋，千万不能把他吓跑了！”

贺龙、任弼时部署停当，下山走进一间茅屋。贺龙突然额头沁出汗珠，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任弼时立即叫来了卫生部长。经诊断，贺龙高烧 39 度，是过度劳累引起的。任弼时恳切地说：“你就到后边休息一下吧，前面的事我负责。”贺龙执意不肯，说：“我万万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真会急出病来。”一句话逗得任弼时和在场的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张振汉并非无能之辈，历来用兵以谨慎细心见长。他令部队当天下午在忠堡集中，是经过认真思索筹划的。他认为，他的部队距忠堡 20 公里，红军主力距忠堡百里开外，红军不会肋生双翅，怎么也不可能比自己的部队先到忠堡。待红军到达，他的部队已经完成防御准备，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然而，遇到贺龙这样的对手，他还是估计错了，如意算盘被红军打破了。

忠堡战斗，从 12 日打到 13 日，红军打垮了敌人的右支队，敌中支队缩回了陈家河，最后只剩下张振汉亲自率领的左支队了。“射人先射马，擒贼

先擒王”。贺龙决定，为了打乱敌人的指挥，以红 6 师第 18 团抽出 1 个营和总指挥部特务队配合作战，直捣敌人的纵队指挥部。

红军总指挥部特务队等，在第 18 团 1 营火力掩护下，乘夜暗向敌军指挥部的山包后面直插进去。红军接近敌指挥部时，被敌警卫分队发觉。双方相距仅几十米。敌人喝问：“口令！哪一部分的？”红军并不答话，勇往直进。接着，敌军官惊恐地吼叫：“卧倒，共军来了！”红军当即扔出几颗手榴弹，便随即蜂拥而上。红军战士端着冲锋枪向敌群猛扫，并夺占了一个制高点，还用机枪火力封锁了敌人的突破口。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失去了指挥和有效的抵抗，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在“缴枪不杀！”“活捉张振汉”的吼声中，敌人死伤枕藉，大部放下武器，投降红军。

天亮后，各部队把俘虏押到一个草坪上。贺龙从俘虏群边走边审视，似乎在寻找什么人。忽然，一个身材高大而肥胖的俘虏，身着紧小的士兵服装，头上缠着绷带，从俘虏堆里缓缓走出来，扑通跪倒在贺龙面前，乞求道：“贺老总！我罪该万死，请老总饶我一命吧！”贺龙定睛一看，眼里立刻射出了严厉的光芒。稍顷脸上露出了笑容，并略带幽默地说：“张司令官，我们是老朋友了，多年不见。你不是要捉我吗，想不到今天我们在这会面了！”张振汉不知吉凶，在贺龙脚下吓得直哆嗦。贺龙见状说道：“好吧，饶你一命！”并告诉卫生部给张振汉治伤。说留下此人，以后还可以有点用场。这时转念一想，张振汉是炮兵出身，随即征询似地对张振汉说：“我看，你留下来给我们当炮兵教员吧！人才难得，你是个人才嘛。”张振汉面红耳赤地说：“败军之将，有何德何能，振汉惭愧！”贺龙说：“当年，我听陈赓说，蒋介石把黄埔一期学生叫来，大骂一顿。他说人才都当了共产党，就剩下你们这群蠢才。这第一句话并没有错，错在下面一句。剩下来的人未必都不是人才。他反人民，反革命，人才再多也不行。你不要气馁，不要以为打了败仗，当了俘虏，就没有才气喽。我的建议，你看如何？”张振汉当场表示：“总指挥，我愿效绵薄之力！”

这位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兼师长的张振汉从此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历尽艰辛，到了陕北，为红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振汉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继续为祖国建设操心效力。同别人谈起贺龙时，他敬佩感激的心情溢于言表。

忠堡战斗，红军深入敌人战役体系纵深，大胆实行围点打援的战法，以大体上与敌人相等的兵力，消灭敌第 41 师师部和 1 个旅，并给其他两个旅又两个团以重大打击，其胜利及意义是重大的。此后，红军又取得了板栗园战斗的胜利，这样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便被打破了。

红军中的妇女工兵营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成千上万的妇女参加了红军，她们中或是大姑娘，或是小媳妇，还有不少是童养媳。她们战斗在内卫、供给、通信、卫生、宣传等战线上。

红四方面军供给部下属有个女工厂，工厂的骨干是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出来的，工人主要是川北参加红军的妇女。工厂的任务是缝制军衣，编打草鞋，有时还担负运送粮食、弹药、战利品。川北山大沟深，羊肠小道险峻陡峭。运输物资完全靠背篓背，上陡坡时要手足三点着地，一步一步地攀登。红军女工厂的女同志背着背篓爬山不亚于男同志。男同志上山还要歇气，女同志

弯着腰，埋头爬，一口气可以爬到山顶。

由于妇女工厂完成任务出色，为了更好地发挥她们的作用，1933 年秋天，四方面军供给部决定将女工厂编为工兵营，由林月琴任营长，王泽南任政委，刘百兴任副营长，全营 200 多人，编为两个连队。从战士、伙夫、马夫、号兵等全由女同志担任。

这个营成立后，适逢上级号召在川陕苏区扩大红军，妇女工兵也组织宣传队，分散到各村寨扩红，使工兵营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排长张荣清，一天到恩阳河宣传，正逢那里赶场。经过她的宣传和现身说法，一天就招收大姑娘、小媳妇七、八十人，她领着这支队伍回到德汉城营部，全城轰动了。妇女工兵营一下子扩充到 500 多人，编为 3 个连，张荣清也升任第 3 连连长。

队伍扩大了，班、排干部不够用，她们又从新参军的战士中选择出身贫苦、表现积极、反应灵敏，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女同志担任班、排干部。其中有一个叫李开英的妇女，不仅动员丈夫戒掉大烟，参加红军，还带着 12 岁的儿子参加红军，她儿子被分配在供给部当通信员。她自己被分配到工兵营，样样工作争着干，组织上决定她担任排长。

工兵营扩充以后，首先抓大家由民到兵的转变，动员妇女们剪去长发和辫子。开始许多人舍不得，干部们耐心地讲道理，干革命，生命都舍得贡献出来，为什么舍不得一条辫子呢？很快全营都剪成短发。接着就组织大家进行军事训练，演习紧急集合，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等。同时还要完成制作被装的任务，以供应部队。

1935 年 1 月，妇女工兵营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旺苍坝，不久就参加了嘉陵江战役。她们除了携带个人的被装外，还要背营里和供给部的贵重物资，每人负重 40—50 公斤，冒着敌机的轰炸和连天大雨，攀沿峭壁，跨过栈道，到达江油、中坝。在那里一面筹粮，一面赶制军衣。

在向北川行进途中，红二连十几名战士掉队，突然与一、二百名敌人遭遇。敌人见十几个女兵，便狂叫着冲过来，要“抓活的”。在营部文化教员杨文局、指导员熊朝喜、排长李开英的指挥下，抗击敌人。李开英机智地叫号兵吹号，调红一、二、三连过来，敌人听到号音和枪声，弄不清红军的虚实，也不敢追赶，她们脱离了险境。

1935 年 6 月，她们随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这个工兵营在长征中，两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除了完成工兵营的本职任务外，还为妇女独立团、妇女运输连和其他部门输送了不少骨干。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第一任工兵营长林月琴、李敏等调到党校学习。胜利到达陕北后，妇女工兵营在第二任营长杨文局领导下，随西路军西征。连长李开英奉命带 1 个连随红 9 军行动，在与马匪作战中，伤亡殆尽。杨文局带领 2 个连，战高台，守仉家营子，战斗出色，尤其连长张荣清在高台战斗中，指挥全连坚守阵地，她自己在与敌人拼刺刀中，一连刺倒 2 名敌人，后被敌人连砍三刀后被俘。妇女工兵营从仉家营子突围后，进入祁连山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与敌人搏斗。这时工兵营只剩下几十名女同志，全部被编入妇女独立团。

妇女工兵营的英雄业绩和悲壮的战斗历程，显示了中国妇女的革命精神，在妇女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泽东为许世友改名

许世友原名许仕友，1905 年出生在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饱受地主、军阀和反动官僚压迫之苦。他 1926 年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 1 师任连长。

他参加黄麻起义以后，就在鄂豫皖苏区作战，他在红 4 军第 31 师，作战勇敢，不断钻研战法，善于带兵，由班长升任到团长。

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战果辉煌，部队迅速扩大。1933 年夏红四方面军把所属各师扩编为军，许 仕友被任命为红 4 军副军长兼第 25 师师长，在川陕根据地的反“ 三路围攻 ”、反“ 六路围攻 ”中屡建奇功。他常常身背大刀，亲临第一线指挥，鼓舞战士们英勇杀敌，在红四方面军颇有名气。

为策应中央红军，壮大革命力量，红四方面军决定主力撤出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突破川军设置的土门、北川防线，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为创建川西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许仕友率 25 师与友邻红 30 军、31 军向土门发起总攻，经过激战，红军于 5 月 14 日占领土门，干沟，并乘胜追击。尔后他又率所部从文镇关、茂县向西渡岷江，于 6 月 3 日占领理番，进逼汶川。6 月 9 日攻占懋功（今小金），歼灭守敌邓锡侯部 2 个营及地方武装 1000 余人。接着又攻占懋功以东要点达维镇。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两个方面军的前锋部队已接近。

6 月 12 日许仕友率红 25 师与红一方面军第 2 师第 4 团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指战员们十分高兴，紧紧握手拥抱，欢呼跳跃，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师的喜讯很快在两个方面军传开，传遍四面八方。

许仕友和红 25 师的指战员在达维镇积极整理内务，张贴标语，腾出房子，准备粮草，迎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

6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镇，当晚举行了庆祝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讲话。他说，中央红军的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这一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号召两个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亲密团结，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剧团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会中，歌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充满团结友爱的情谊。

6 月 18 日党中央机关到达懋功。

毛泽东对许仕友的战绩和占领懋功、达维镇的行动已有所闻。一天，毛泽东见到许仕友，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和他交谈，问长问短。当说起许仕友的名字时，毛泽东风趣地说，“ 喔，仕友，你可是当官的朋友啊。 ”毛泽东的幽默使许仕友的脸顿时红了起来。他对毛主席说，“ 已经改了。我是大老粗。原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参加红军以后有空我就学习文化，才知道‘ 仕 ’是要做官的意思，我就悄悄地把当官的仕改为‘ 士兵 ’的士了 ”。

毛主席听了以后拍着他宽阔的肩头说，“ 哎，你坐下，我们需要商量一下，改一个字行不行？ ”毛主席略一沉思，指着远方高低起伏的山峰说，一个红军战士嘛，需要看得远一些，把士兵的士改成世界的‘ 世 ’好不好？这个字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红军战士，不仅要想到全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 ”

毛主席说完，许世友连连点头，以后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李先念程世才激战包座

红军左、右两路军，于 1935 年 8 月 21 日从毛儿盖地区先后出发。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然后在草地的那一边巴西会合。巴西离毛儿盖有几天的路程。

位于松潘北部，距离右路军驻地巴西、班佑 100 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这里山高路险，森林密布。有胡宗南部独立旅的第 2 团分驻把守。

守敌利用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储备大量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工事。

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后，急调他驻扎漳腊的伍诚仁第 49 师，星夜兼程，向包座增援，企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道路。

抢在敌增援部队赶到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前面的紧急任务。如果丧失战机，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此时右路军第 3 军尚未通过草地，第 1 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的第 30 军、第 4 军承担。

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

红 30 军是右路军左翼先头，在先遣司令员叶剑英的率领下，经过艰苦的行军，于 8 月 26 日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不久，即接到前敌总指挥部发来的急电：

“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 49 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消灭 49 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 49 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短短的电文，把目前面临的形势、处境和任务交代得清清楚楚。红 30 军政委李先念和军长程世才作了简短的研究之后，命令部队立即整装，以 89 师为军的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

总部的电报还要李先念和程世才去向中央汇报。他们部署完毕以后，即策马急行，直奔党中央驻地巴西。一路上，由于心情急迫，两人扬鞭催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巴西，而后直奔中共中央驻所。

在一座寺庙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

徐向前总指挥向毛泽东介绍程、李两人之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只见毛泽东穿一身普通的灰布衣服，戴着八角帽，高高的身材，由于连续的艰苦转战看上去显得十分清瘦，但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毛泽东握着李先念和程世才的手，很高兴地说：

“你们都这样年轻啊！”

这时李先念二十六七岁，程世才 23 岁，都很年轻。望着毛泽东和蔼可亲的笑容，程世才很快消除了紧张和拘谨。毛泽东拿过一张川陕交界的略图，因为寺庙里没有桌子，就把地图铺放在地上，大家环绕着地图围成一圈，有的坐一块木板，有的干脆蹲下。

毛泽东听完李先念他们的汇报，接着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用手指着地图上陕西的西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的北部说道：

“我们要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比较多的地区，而且敌人相对

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派系复杂，内部矛盾很多，这些都有利于我军发展壮大，站住脚跟。”

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在川陕甘交界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重要意义，谈了大约 40 多分钟。最后，他用手指着地图上的甘肃南部，用力向东一挥，说道：

“为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先要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

接着，毛泽东抬起头来看着程世才和李先念：

“但现在胡宗南抢先占了包座，又派 49 师赶来增援，我们如果不消灭这个敌人，就走不脱。”

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插话说：

“我军各部现在还未靠拢，1 军出了草地，3 军还在草地之中。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争取时间。”

毛泽东接着说：

“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 30 军、4 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

徐向前总指挥对他们说道：

“我们决心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拿下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力量打援。中央已经批准了前总的作战计划。你们 30 军先以一部攻占包座，尔后集中力量消灭 49 师。4 军以一部攻占包座以北的求吉寺。1 军在巴西和班佑之间集结待机，并负责保护中央的安全。你们目前要抓紧时间尽快到达并占领包座，尔后迅速做好打援的准备。我和叶剑英同志的指挥所设在上包座以北的末巴山上。”

李先念和程世才为能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而感到非常光荣。他们向毛泽东表示，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保证完成任务。

离开毛泽东后，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领红 30 军加快向包座进发。巴西距包座约两天的路程，而增援的敌人同样可能在两三天内到达。抢在敌 49 师到达之前强占包座，占据有利地形，是摆在红 30 军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在行军途中，程世才、李先念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和前卫团 264 团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大家研究并确定了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为尽快拿下包座，首先集中 89 师强攻包座，歼灭包座守敌。

考虑到消灭敌 49 师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个大仗，李先念对与会的同志十分严肃地说：

“我军肩负着打开北进通道的重要使命，能否消灭敌人将直接关系到全军能否顺利北上，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看着我们，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

他要求部队要认真做好政治动员和细致的准备，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会后，红 30 军向徐向前总指挥电告了他们的决心和计划，徐总当即予以批准。任务传达到部队，指战员们情绪十分高昂，大家纷纷表示：

“打 49 师我们包打包胜，让毛主席、党中央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行军途中，天下起了大雨，雨水淋湿了每个人的衣服，但人人心中犹如有一团火，为战斗的渴望，胜利的渴望所激励，两只脚不停地在泥泞的道路上飞奔着，全军指战员怀着最大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向包座进发。

红 30 军快速猛进，29 日下午，89 师前卫团已抵达距包座西北七八里的地方，部队不顾行军疲劳，立即向敌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包座守敌是胡宗南独立旅的 1 个多团，从南坪到达包座已经五六天了，

敌团部驻在大喇嘛寺（大戒寺）内。这座寺北面紧靠一座五六百米的大山，寺前有一条小河，虽然只有两丈宽，但因为正值雨季，河水深而湍急，东面则是贯穿上下包座的包座河，这些都对红军行军造成了障碍。

敌人占据了以大喇嘛寺为中心的一带有利地形，利用山险隘路和茂密的丛林作掩护，构筑了许多明碉暗堡和各种工事，并备有大批粮食，组成了上下结合，比较严密和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地区。同时，敌人装备很好，火力十分猛烈。

程世才和 89 师邵烈坤师长在包座河西的河边指挥战斗，几乎听不到枪声的间断，全是机枪在哒哒的响。程世才清楚地看到，敌人坚守在隐蔽的工事里向红军猛烈射击，红军战士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战士们打得十分英勇。

由于地形不利，天又下着大雨，河水暴涨，长途行军后，指挥员们浑身透湿，十分疲劳，敌人又凭险据守，89 师前卫 264 团从下午 3 点多钟一直打到晚上 9 点钟，才攻占了大喇嘛寺外围北山山脚下的几个碉堡和西坡半山腰的 1 个碉堡，歼灭两个连的敌人。从俘虏的敌军军官口中，红军了解了包座守敌的情况，并且得知敌 49 师将于明天到达包座。

根据当前的情况，程世才和李先念商量，包座守敌以逸待劳，地形又对敌人十分有利，红军要很快拿下包座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坚持打下去，不但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最重要的是会由于时间拖延，直接影响和耽误明天与敌 49 师的决战。于是他们当即决定，264 团从西、北和东北 3 个方向将包座守敌包围起来，围攻敌人。变强攻包座为围点打援。89 师另两个团立即调往包座西南地区和 88 师一同进行打援的准备。

翌日上午，红 30 军除用 1 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包座守敌外，将 88 师和 89 师的大部兵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的西南山上，并派 1 个连控制了东山制高点。这座山地势险要，像一座刀背梁子，西可瞰制增援之敌，北可对大戒寺守敌形成包围。战士们攀登而上，占领了该地。前方则派出侦察部队监视敌人，并向松潘方向派出了侦察人员。

据俘虏供称，敌人增援部队将在这天下午到达，但敌人没有按时来。经过连续行军的红军很是疲劳，尤其是各级指挥员因通宵未眠，两个眼皮常常不自觉地合拢一起。然而，大家都想尽办法抑制瞌睡，焦灼地等待着战斗。又等了 1 夜零半天，敌人才沿着松潘到包座的道路浩浩荡荡而来。当敌人先头部队离红军 10 几里地时，战士们兴奋地说：

“该死的敌人，你到底来了！”

中午 12 点，战斗打响了。为了全歼敌人，红军预定等敌人主力进入埋伏圈内后再出击。

可是实际情况并不顺利，敌人十分狡猾，不肯轻易冒进。他们先以一部兵力搜索前进，与红军接触后，先进行局部战斗，夺取有利地形后主力再前进。

程世才、李先念看穿了敌人这一诡计，命令在山上的主力部队隐蔽好，只以正面的 263 团一部在一些次要的小山头上抗击，给敌人大量杀伤后就节节撤退，诱敌进入伏击圈。这里的山是一漫坡的，顺着高山下来有许多小山包，山上尽是松树林，十分便于隐蔽。

骄傲的敌人像瞎子一样，摸不清红军的情况，又因为距离包座只有 10 几里路，救急心切，就快速前进，结果正中了红军之计。

在节节抗击中，红军不仅给了敌人不小的杀伤和消耗，而且摸清了对方的战斗力和作战特点：敌方战术动作和小集团（连、排）战斗比较灵活，并相当顽强；其火力很强，每次冲锋时，除了有很多轻重机枪掩护外，还用迫击炮、小炮等武器轰击红军前沿和纵深，杀伤红军实施机动的兵力。距离火线只有二三里的红 30 军指挥所附近，也不断地有炮弹爆炸。

上述情况，程、李两位首长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决定，在红军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时，采取多梯队攻击，队形疏开，火力集中，快速运动，快速接敌，并冲得猛打得狠。

为了吸引敌人尽快全部进入红军的预设战场，程、李首长命令 264 团加强对大戒寺守敌的围攻。不久，获得了敌人两处重要的情报：大戒寺守敌团长急呼 49 师迅速来援，他说有“大批共军正在猛攻包座”，他已“很难支持”；胡宗南则严令 49 师必须于当晚进驻包座。

这时，敌前卫团已被诱至包座以南 10 里处的地区，程、李首长命令 263 团坚决抗击，再不准敌人前进一步。敌人加强了攻势，向 263 团发动猛攻。263 团的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声一阵紧似一阵。

与此同时，敌师本队团排成几路纵队，向包座方向蜂拥急进。

敌人的行动加快了。

程世才和李先念当机立断：以 265 团和 263 团主力出击，决不能让敌人突破 263 团的阵地，靠近包座。同时吸引敌后卫团迅速来援，尔后再出动主力全歼敌人。

命令下达后，88 师在熊厚发师长和郑维山政委的指挥下，两个团奋勇直插敌阵，一扑下去就先干掉了敌人近 1 个营，将敌人一劈两半，斩断了敌前卫团和师本队团的联系。接着 263 团全力围攻敌前卫团，265 团向南打击敌师本队团。

这一招揍痛了敌人。敌人眼睁睁地看着包座，却迟迟进不了包座。现在又被红军一劈两段，前卫团又陷入包围之中。

在本队团中指挥的敌师长伍诚仁恼羞成怒，一边令本队团全力猛攻 265 团，一边急令后卫团快速推进，企图两团汇合一起打退红军，并解包座守军之围。

伍诚仁还自以为得计，岂知正好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

下午 3 点多钟，敌 49 师全部进入红军的预设战场。程世才、李先念立即发出总攻命令。这时，但见隐蔽在山上的红军主力，随着冲锋号声，一齐向敌人出击。

一时间，枪声、喊杀声、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十几里地的战场成了一片火海。

红 268 团和 267 团的动作异常勇猛，一下子将敌师本队和后卫斩成两段。这样，整个敌人便被红军斩断成三截。敌人为打通联系，疯狂地向 268 团反扑，而 268 团则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在敌人中间，连续打垮了敌人数次冲击。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

在总的攻势上，红军居高临下，但敌人是纵深配置，并占据着许多小山头。尤其是漫山遍野都是大桦树和灌木丛，敌人运动兵力红军看不到。红军冲到哪里，那里的敌人利用树林、山包或河坎作掩护，拼命地守卫，拼命地反击。程世才立即把军部的几门迫击炮调来支援 88 师，用仅有的几十发炮弹轰击敌人集群。

战士们用手榴弹、刺刀和大刀片同敌人厮杀。有的马尾手榴弹挂在树上，杀伤不了敌人，战士们就端着刺刀或挥着大刀片扑上去。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又冲上去，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个山头也要经过几次争夺，敌人抢占了，红军就再把它夺回来。有一位战士，一只胳膊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握着大刀片而英勇牺牲。

伟大的红军战士，他们在草地上吃的是野菜、树皮，为人民贡献出的是宝贵的生命和鲜血！

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七八个小时。红军终于把截成三段的敌人，一段段地啃掉了。敌师长伍诚仁胳膊被打断，被红军俘虏。战士们押着他来见 88 师郑维山政委。这个刚才还神气十足的敌师长，现在却吊着个受伤的胳膊，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但后来由于天黑下大雨，伍诚仁乘着战场混乱之机，跳河逃跑了。敌人的 1 个团长和副团长也做了俘虏。

围歼敌 49 师的战斗即将结束时，程世才、李先念命令留作预备队的 269 团主力迅速回返大戒寺，协同 264 团消灭包座守敌。到半夜两点钟，歼灭了两个多连的敌人，攻占了大戒寺的北山，并从西南面攻入寺内。敌人终于抵挡不住了，他们放火焚烧了寺内的粮库，敌团长带着 400 余人趁着大雾从东南方向逃往南坪。

守在大戒寺后东北高山的残敌，约 200 余人。红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将他们紧紧围住，展开了政治攻势。红军攻占大戒寺后，敌人见大势已去，便全部下山缴械。红军胜利地占领了包座。

包座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将敌 49 师和另 1 个多团大部消灭，打死打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 4000 余人，敌人除一部分逃跑外，大都作了俘虏，红军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弹药、粮食和牛羊，补充了自己。

就在红 30 军围歼敌 49 师的同时，红 4 军一部也在求吉寺同守敌展开了激战。由于敌凭险固守，部队攻击很难奏效，伤亡不小。战斗中，红 10 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上，向敌人猛烈射击，指挥并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经过激战，求吉寺守敌在午夜全部被红军歼灭。

至此，上下包座被红军占领，共歼敌 5000 余人。

包座战斗，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 1 个整师的重大胜利，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

1935 年 6 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兵力达 10 余万人，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广大指战员异常兴奋喜悦，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6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在两河口，迎接前来会见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天，举行了两个方面军会师大会，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赞扬了红四方面军迭挫强敌、发展壮大的光辉业绩。张国焘讲话中却语气傲慢，流露出同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左的情绪，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一丝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都发了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

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后，朱德曾与张国焘彻夜长谈，希望红四方面军占领松潘地区，打开北上道路。张国焘认为松潘敌人强大，拒绝了这个建议。

两河口会议之后，朱德按“松潘战役计划”，率一方面军北进，接连翻越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拖罗岗等几座雪山，先头部队于 7 月 16 日攻占离松潘不远的毛儿盖。

在红一方面军北进后，张国焘却迟迟按兵不动。原来，他以为红一方面军有 10 万人，现在实际上只有 2 万多人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便膨胀起来。他唆使其追随者以“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为借口，致电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凌驾于党中央和军委之上。

为了维护两个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 7 月 18 日在芦花召开会议，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由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之职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这样，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北进至芦花。7 月 21 至 2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川陕苏区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和多次打破敌人“围剿”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

但张国焘却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也有少数人指责红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这也引起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张国焘挑拨离间以借口。这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深感忧虑。他在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因此受到四方面军同志的拥戴。

8 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为此，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部率领，辖第 5 军、9 军、31 军、32 军、33 军等，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第 1 军、3 军、4 军、30 军等，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中央政治局还在沙窝召开会议，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则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

会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朱德将和为人狡诈、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共事，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红军分路行动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在阿坝会后北上的计划，提出“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宜走右路”。但是张国焘坚持西出阿坝，甚至主张深入到青海、宁夏、新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 8 月 20 日在毛儿盖开会，讨论夏洮战役以后的行动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是“危险的退却方针”，

因为它将适应敌人想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陲地域的需要。会议决定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8 月底，党中央和右路军经过草地，到达包座、班佑地区，等候与左路军会合，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抵达阿坝的左路军才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在草地行进的第三天，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涨水挡住了去路。不愿意向右路军靠拢的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致电党中央，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撤向松潘。

朱德坚持执行中央意见。为了弄清噶曲河水情，他亲到河边，派警卫员探测河水。警卫员骑马过河又返回来，证明队伍是完全可以过河的。朱德更坚持左路军过河后向班佑前进。为此，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争论。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意见，下令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令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

中央得悉这一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决定率红 1、红 3 军于 9 月 10 日凌晨先行北上。11 日抵达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示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中央电令，又致电红 1、红 3 军领导人，声称“1、3 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 1、3 军“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在此电报上签名。

张国焘回到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对朱德的围攻。他唆使其追随者同朱德谈话，要朱写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文章，朱断然拒绝。张国焘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开会，攻击党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予理睬。张国焘急不可耐地说：“总司令，你可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从容镇定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北三省和华北部分地区，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的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有人冲着朱德喊叫：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赶快走！

朱德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这时，刘伯承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别的不说，他还是一个年近半百的长者嘛！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矛头又指向了刘伯承。刘伯承也不示弱，表明了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态度。

张国焘没有在阿坝会议上压服朱德、刘伯承，就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小会议，一面不断攻击中央，一面继续对朱德施加压力。他的追随者甚至谩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朱德沉着坚定，任凭他们怎么斗，怎么骂，总是不动怒，不生气，沉默不语，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他们骂完了，才慢慢同他们讲道理。

有一次，张国焘在会上造谣说党中央撤离某地时，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怒不可遏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草，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

9 月 17 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 4 军、30 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 10 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10 月 5 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揭起反党旗帜，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并胁迫朱德表态，要朱同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知道，我们“朱毛”在一起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威，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声明：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卓木碉会议以后，朱德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形同阶下囚。他们不得不做以防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片刻说：“过去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张国焘知道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未敢对他们采取极端的手段。不久，把刘伯承调到红军大学工作，实际解除了他总参谋长职务。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队去，这使他有了接触部队的机会。他见到原第五、九军团的指战员，总是告诫他们要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耐心克服眼前困难，同四方面军同志搞好团结。他还常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接触和交谈。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亲切凝重的态度，朴实至诚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当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坚持原则的同志时，朱德总是千方百计予以保护，使一些人幸免于难。

此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虽取得击溃川军 7 万余人的胜利，但由于百丈战斗失利，加之严冬到来，部队衣食不继，处境日趋艰难。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 8 万人，锐减到 4 万人。挫折和失败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对党中央和朱德同志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个转机。

1936 年 1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 1935 年 11 月由苏联回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这对张国焘不啻为当头一棒。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转变立场，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朱德和刘伯承乘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

领导。

到了 2 月，战局的发展对红四方面军更加不利。朱德和徐向前认为不能再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了，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康北的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正在这时，党中央又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以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情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赞成第一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红军受损，又知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方案。

2 月中下旬，红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北上，3 月 1 日占道孚，15 日克炉霍。到 4 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连瞻化、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

在此期间，红二、红六军团根据朱德、张国焘的指示，离开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于 5 月下旬进入康南，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望。张国焘迫于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取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 6 月 6 日宣布取消“中央”，成立西南局。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宣告失败。后来，在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尽管张国焘又节外生枝，不愿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在党中央和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斗争下，终于在 10 月到达甘肃的会宁和静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1 月底，朱德率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和中共中央会合。毛泽东对朱德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吕端大事不糊涂

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总是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捍卫革命利益，表现出了鲜明的阶级性、高度的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因为他在中国革命史上多次使革命化险为夷，为我们党、我们的军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所以被毛泽东誉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27 年 7 月下旬，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那时汪精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企图利用诱骗手段，扣押贺龙、叶挺。他准备上庐山召集黄琪翔、孙科、朱培德等人秘密开会，策划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叶上庐山开会，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得知这一阴谋后，连夜找到叶挺，不顾个人安危，将汪精卫的密谋告诉了他，并商定立即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商定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次日，他们坐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摆出游湖赏景的架式，密商对策，从而使汪精卫的反革命阴谋未能得逞，保证了南昌起义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飞向大江南北，张发奎气急败坏地连忙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准备部署追赶起义部队。张发奎正要下达命令，作为参谋长坐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开了腔，他朝着张发奎不慌不忙地说；“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东，不追叶贺为好。”接着，他分析面临的战局，讲出了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

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到那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赶上，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

张发奎一听，觉得叶剑英说的这些正合他早就想占据广东地盘的心愿。于是，当即放弃了尾追叶、贺的企图。

叶剑英的机智灵活，稳住了张发奎，从而大大减轻了南昌革命起义军南进的压力。

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省懋功地区，会师后，党中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战略方针。当时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人多势众，向党闹独立，提出向川康发展的意见。6 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8 月下旬，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却主张左右两路红军主力全部南下。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犹豫不决，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而张国焘不听中央的耐心说服和三令五申的催促，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竟然背着中央，于 9 月上旬，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了“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的意见，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那天，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在作报告。叶剑英看到电令后，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会场，带着电令跑向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感到情况紧急，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跑回原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大家认为，再继续劝说等待张国焘率领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这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党与红军的命运的严峻时刻，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的决议，中央决定率红 1、3 军迅速离开扎西。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很快到三军团驻地，与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一致确定了党中央和红 1、3 军立即北上的方针。

与此同时，叶剑英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当时唯一的一份甘肃省地图，以备党中央和 1、3 军北上时急用。党中央在离开扎西之前，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曾通知他一起离开，他说：“ 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军委纵队一同行动。 ”

次日凌晨两点，叶剑英以“ 打粮 ”准备南下为由，与军委纵队的其他领导一起将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带了出来，与党中央会合执行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及时地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纵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

多少年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多次提到此事，并且赞扬叶剑英是“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 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

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也曾说：“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英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尚品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血洒四坡村

长征开始以来，红 25 军边打边走，走走停停，经过激战独树镇，庾家河反击战，袁家沟口伏击战，歼灭大量国民党军，于 1935 年 8 月 21 日由白水镇东进，准备翻过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母宫塬，南渡汭河，向陕甘苏区前进。

王母宫塬属黄土高原，位于泾河和汭河之间。红军冒雨翻过王母宫塬后，陡峭的断崖底下便是奔流不息的汭河。汭河平日水流缓慢，深不没膝，人马可以安全徒涉，此时由于连日暴雨，山洪爆发，河水陡涨，给部队渡河造成极大困难。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在岸边指挥部队渡河。他浑身被雨水湿透，面孔铁青，双眼布满血丝。他指挥手枪团和红 225 团抢先渡过河去，占领南岸高地，向泾川方向警戒，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恰在军供给部和军医院过河时，洪水突发，河水骤涨，咆哮的山洪挟着泥沙犹如一匹脱缰之马奔腾而下，有几名战士不幸被洪水吞没。吴焕先见状，立即命令停止过河，抢救落水战士。一时，全军的骡马担架、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伤病员全都拥挤在汭河北岸。

此时，王母宫塬上忽然枪声大作。敌第 35 师第 104 旅第 208 团 1000 余人，在 1 个连的骑兵配合下，由泾川县沿着王母宫塬向红 25 军袭来。在塬上四坡村担任掩护任务的红 223 团第 3 营，首先与敌人开火，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同敌人展开激战。为配合第 3 营抗击敌人，机枪连连长戴德归，奋不顾身把重机枪架在窑洞顶上，向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扫射，压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这时，红军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难以回援，担任掩护任务的红 223 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的险恶境地。

红 25 军首长命令红 223 团第 1、第 2 营投入战斗，从正面阻击敌人的进攻。吴焕先率军部交通队和学生连 100 多人，从右翼插入敌后，截击敌人。指战员不顾泥泞路滑，跑步冲上塬顶，抢占了几座高地，从侧后向敌人发起猛攻。吴焕先振臂高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

只顾向四坡村发动进攻的敌人，没有料到从背后杀出一支奇兵，便分兵掉转枪口负隅顽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吴焕先政委，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也染红王母宫塬上的土地。

听到吴政委负伤的消息，红军战士们悲愤交集，仇恨满腔，怒吼着：“为吴政委报仇，冲啊！”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敌人终于不支，纷纷夺路而逃。红 223 团在火力掩护下，从正面发起冲锋。慌不择路的敌人被压至一条烂泥沟里，悉遭全歼，敌团长马开基也难逃覆灭的厄运。

四坡村一场激战胜利地结束了，然而红军广大指战员却没有一丝喜悦。因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年仅 28 岁的亲爱的政委吴焕先因伤势过重，英勇地牺牲了。他的牺牲，是红 25 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一袋救命粮

谢益先同志参加红军前是个穷苦的农民，家中一贫如洗，他同母亲和弟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直到共产党在他家乡领导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他家才翻了身。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反动派又翻了天，向穷人反攻倒算，并打死了他的母亲。他怀着深仇大恨埋葬了母亲，把不懂事的弟弟寄养在亲戚家里，一跺脚当了红军，决心为穷人打天下，求翻身。

他平常寡言少语，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入伍时间不长，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很快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一到战场上，他就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反动派消灭光。对待同志和人民，他像春天般的温暖，满腔热情，甚至想把心掏给人家。

红军长征到了毛儿盖，这里是草地的边缘，上级决定在此筹粮，准备北上过草地。那时虽然正是收获季节，可当地人烟稀少，部队多，粮食不敷分配，每人只分了三四斤小麦。可它是救命粮，大家都把它视作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行军带着它，睡觉枕着它，有人还在袋子上绣着自己的名字。谁心里都明白，这几斤麦子同生命几乎可以划等号，没有它，要想活着走出气候恶劣的茫茫水草地是难以想象的。

红军是铁打的英雄汉，他们带着这仅有的一点粮食和简单的行装，踏上了人迹罕至的水草地。草原上气候恶劣，时阴，时晴，忽雨，忽雪。没有道路，没有向导，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可食的东西。草丛下沟渠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脆，人在上面行走，稍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难以自拔，甚至有灭顶之灾。

一天，红军正在没膝的水草地中跋涉，忽然听到前面有孩子的哭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坐在草地上。看他们瘦骨嶙峋的样子，就知道饥饿在长时间折磨着母子三人。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年轻的母亲饥肠辘辘，但一面拍着怀中的孩子，一面哄着，“好孩子，别哭，明天妈给你们买烧饼。”身边大一点的孩子听说“烧饼”二字，抬起头来，眼睛亮了，但有气无力地问：“妈妈，能买到烧饼吗？”母亲眼睛里的泪水滚落下来，呜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红军指战员都在母子面前停留一下，有的抓一把炒麦递给那个妇女，有的摸摸干瘪的粮袋遗憾地走开了。

部队继续前进，但行列里却少了谢益先同志。同志们正在着急，以为他掉队了，他却从后面追上了队伍。“你怎么才上来，病了吗？”刘文章关切地问道。“没有，看那两个孩子去了！”他若无其事地回答。“你认识她们吗？”

“我怎么能认识她们呢！那个归女说，她是川陕根据地来的，亲人都被国民党杀了，房子也被烧掉了。她和一些老乡们在红军掩护下，才带着孩子逃出来。可是虎口余生，又到了这不毛之地。如今断粮了，大人还可挺一挺，可孩子怎么受得了。”

听他这番话，同志们心里都感到沉甸甸的，可是，像她们这样的穷苦人，比比皆是，真是爱莫能助，至少是难助呀。

从此之后，谢益先同志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一到宿营地，他就忙着拾柴、烧水、搞卫生；现在，只要放下背包，他就一人悄悄走开，等大家吃完干粮才露面。同志们若问他：“吃了吗？”他就拍拍肚子说：“吃了！”后来，秘密终于暴露了。原来，他是有意避开战友，去找野菜去了，遇到没有野菜可吃，就干脆喝点凉水充饥。

这样下去怎么行呢？班长对他说：“你多少还是要吃点粮食，要是不够，

大家可以凑点！”“日子长着呢，现在能省就尽量省点。班长，你放心，我还有干粮呢！”他回答得很坦然。

“别把身体拖垮了！”“没什么，在家吃苦吃惯了。”他决心咬着牙关渡过困难。

话虽这样说，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同志们常常发现他走起路来老是东摇西晃，人也瘦得厉害。就这样，他丝毫没有松懈自己的斗志，有事就和别人抢着干，每次到远处送信都少不了他。

人的精神作用和革命毅力毕竟是有限的，他终于支持不住了，行军中一步一喘，几步一歇。一次休息时，他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他在牺牲前，嘴里还在念叨：“那两个孩子不知怎么样了？”直到副班长告诉他，到团里送信的同志曾经看到那个妇女还跟着团部时，他那瘦削蜡黄的面部才露出了笑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大约是在部队走出草地的那天，同志们又看到了那位妇女。她带着两个孩子正在路边张望，一下子认出了谢益先班上的同志，便高兴地走过来，笑着向同志们打招呼：

“喂，同志，姓谢的同志在吗？”“叫谢什么，我们有好几个姓谢的。”一个同志回答说。

“咳，就是不知道叫啥名，问他时他不说。要不是他留下这条粮袋，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呢！”说着，她拿出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干粮袋，上面用白线歪歪扭扭地绣一个“谢”字。啊！这不是谢益先同志的粮袋吗，怎么到了她手里呢？没等同志们寻根问底，她就说起来了：

“那可真是个好同志，救命恩人哪！那天，你们都走过去了，他站在我们跟前问长问短，看着我那空米袋子直摇头。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我。这可不行，粮食就是人们的生命，我怎么能全收下呢？可他说：‘拿着，大人好办，孩子年小体弱不吃东西可不行啊。’说罢，丢下粮袋就走了，我怎么喊，也喊不住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吭声。唉！多亏这些干粮哪，不然，我们娘三个早就饿死了。”说着，她又问那个姓谢的同志哪去了。

现在，班里的同志才明白，谢益先不吃干粮，是因为他把干粮送给了老乡。他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同志们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出了什么事情？”那个妇女见状收敛了笑容，不安地问道。“他……他死了”一个同志抽抽噎噎地回答。

她眼圈红了，紧接着两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干瘦的面庞滚落下来。她低下头，两手抖动着空空如也的粮袋，目光呆呆地盯着布袋上的“谢”字，然后又弯下腰，对孩子说：“孩子，永远记住，我们是红军用生命救出来的啊！”

红军智战腊子口

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右路军离开巴西以后，于 1935 年 9 月 12 日到了川北的俄界。这里是个藏族地区，由一个姓杨的土司控制。他对红军不怀敌意，把粮食送给红军，红军也回送了一些枪支给他。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

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相应作出组织决定：

任命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领导人：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会议之后，部队改编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红军又匆匆上路，向腊子口进发了。

腊子口是通往甘南的咽喉。毛泽东决定歼灭腊子口守敌，并以毛泽东、聂荣臻和林彪署名，于 9 月 14 日发电报告诉彭德怀：

“ 顷据 2 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

随后，红一军团的几个指挥员，冒雨赶到 2 师去，把师长陈光和 4 团干部叫在一起，一边看地形，一边研究打腊子口的部署。

党中央和毛泽东则驻在朵里寺等待消息。

红一军团 2 师 4 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两天内攻取腊子口，然后去甘南的岷县。

腊子口山岭陡峭，易守难攻。16 日，4 团还没有到达腊子口，在路上就打了两仗，消灭了敌鲁大昌 14 师派来堵截红军的两个营。下午 4 时，4 团的先头部队接触了敌人。

腊子口果然是一处天险。口子很窄，只有 30 米宽，仿佛原来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从中劈开成两半似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有一条河流——腊子河，水深而流急，只有一座木桥架在两山之间，它是突破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国民党新编第 14 师师长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之间，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把守，桥头筑有碉堡。

9 月 17 日凌晨，4 团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并在当天穷追 45 公里，占领了大草滩，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盐 2000 斤。这些物资，对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

1935 年 9 月 14 日，红一军团的红 4 团，长征来到了甘肃境内白龙江边的莫牙寺。

15 日黄昏，只听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来。大汗淋漓的师部通信员翻身下马，送来一封急信，信中写道：

“ 军团首长命令即速继续北进，着第 2 师第 4 团为先头团，具体向甘肃之南的岷州前进，3 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 ”

接到命令后，红 4 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立即召集团的主要干部开会，研究分析情况，作好行动的一切准备。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

腊子口可能是北上途中最后的、最险要的一道关口，突破了腊子口，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就会彻底破产，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就能胜利实现。如果拿不下腊子口，红军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草地。这将使革命向后倒退，是违背广大指挥员“ 北上抗日 ”的意志的。如果采取西进绕道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三国时孔明六出祁山的旧地——汉中，就要踏进敌人早已布下重兵的口袋，那将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眼下只有突破天险腊子口，才是唯一的出路。

统一了思想后，大家就考虑怎样打，大家摊开地图计算了一下，从莫牙寺到腊子口足足有 200 来里。

这时，侦察员送来了重要情报：腊子口那里有鲁大昌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 14 师驻守。由于鲁大昌的老窝在腊子口不远的岷县，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

盘，阻挠红军的前进，除了派出第 1 旅旅长梁应奎率领重兵在腊子口以南重重设防外，还在岷县城外，大拆民房，扫除障碍，扩大射界，增设碉堡，妄图阻击红军进入陕甘地区。

敌已有备，军情紧急，刻不容缓！

会议刚一结束，团领导就立即到各个连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而且决定连夜行动。

漆黑的夜幕，覆盖着山山岭岭，红军战士踏着黑黝黝的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走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个又一个独木桥，可以听到白龙江在深谷里发出的哗哗流水声。

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行军，红 4 团来到腊子口前。

9 月 17 日午后 4 时许，腊子口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红 4 团先头 1 营已与敌人交上了火。

天险之战的序幕揭开了。

王开湘与杨成武策马急驰，待到达腊子口时，1 营正和敌人打得难分难解。由于是白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红军无法隐蔽，冲锋的队伍，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和冰雹般的手榴弹挡了回来。

王开湘和杨成武回来后又立即领着全团的营、连干部，到前面察看地形。

杨成武架起望远镜，抬头看去，但见这里地形果然极为险要，沟沿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斧劈开，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只有 30 来米宽，又像是一道用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

再往下看，只见腊子河从河底流出，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运动的漩涡，水深虽不没顶，但由于流急不能徒涉。

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通过腊子口，非过此桥不可。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据俘虏说，这个工事里有 1 个机枪排防守，4 挺重机枪对着红军进攻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100 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这个重兵把守的碉堡，成了红军前进的拦路虎。石堡下面还筑有工事，与石堡互为依托。

透过两山之间 30 米的空间，可以看到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山坡上筑有不少的工事。就在这两处方圆不过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有两营之众，此外还有白天被红军击溃逃到这里的敌人。口子后面是腊子山，山顶覆盖着白雪，山脉纵横。据确切的情报，鲁大昌部两个营扼守着口子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红军的去路。

经过反复缜密的侦察和 1 营攻击时敌人暴露的火力，杨成武发现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顶；二是口子上敌人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因为都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发现敌人。

敌人石堡旁边的悬崖峭壁从山脚到顶端，约有七八十米高，几乎都仰角八九十度，山顶端是圆的，而石壁既光又陡；连猴子也难爬上去，石缝里零零星星地歪出几株弯弯扭扭的古松，敌人似乎没有设防，可能是因为它太陡太险。

王开湘和杨成武边观察边研究，觉得倘若能组织一支迂回部队从这里翻越上去，就能居高临下地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的碉堡，配合正面进攻，还可以

向东出击，压向口子那边的三角地带。

可这面绝壁看着都叫人头晕眼花，如何上得去呢？

现地观察回来，4 团就在离口子 200 多米远的小路旁一个小树林子里召开干部会，研究了战斗方案。会上研究的重点是否能攀登陡壁，可是讨论来讨论去，点子不少，把握不大。

军事民主是红军的老传统，杨成武又要求各连部召集连队的士兵大会，要大家献计献策。

一个贵州入伍的一名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大家都惊奇地望着他。于是，全团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苗族小战士的身上，决心做一次大胆的尝试。

腊子河水流太急，难以徒涉，就用一匹高头大马把苗族小战士送过去。绝壁紧贴着腊子河，杨成武他们站在这边的小树林里，看小战士用竹竿攀援陡壁。这里离敌人虽仅 200 来米，但向外突出的山成了死角，敌人看不到红军。

只见那小战士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的绑腿接成的长绳，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细的歪脖子树拉了拉，一看很牢固，两手使劲地握住竿子、一把一把地往上爬，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到了竿头顶点，他像猴子似的伏在那里稍喘了口气，又向上爬去……

小战士终于上去了！杨成武这才感到脖子已经仰得有些发僵了，不由得长长地舒了口气。小战士在上面呆了一会儿，又沿着原来的路线返回来了。杨成武忙走上前去，紧紧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他咧嘴笑了笑，仿佛在说“我说了，能上去嘛！”

天将黄昏，4 团又抓紧时间，做两面出击——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的准备工作。王开湘和杨成武研究决定，迂回部队由侦察队和通信主任潘锋带领的信号组以及 1 连、2 连组成。正面强攻的任务由 2 营担任，6 连为主攻连。

在艰巨任务面前，为人笃厚的王开湘团长对杨成武说：

“政委呀，过泸定桥你在前面，这回我来带翻山部队迂回敌人，你在正面统一指挥！”

说着，王团长摆出一个无可争辩的姿态。

杨成武笑了笑，心想由团长带领迂回部队，当然是把握十足的。就说：

“好！我在下面指挥强攻。”

4 团当即把情况和决定向师和军团首长作了报告。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马上赶到了现场，因为此一战，关乎着全军能否顺利北上啊！

黄昏前，迂回部队已动员完毕，他们和侦察连的同志们组成一个整体，并且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了几条长绳，作爬崖之用。

灿烂的夕阳下，勇士们一个个精神饱满，背挂冲锋枪，腰缠 10 多颗手榴弹，在王团长的率领下渡腊子河。

开始，部队试图徒涉，但下去两个人还没到河心，便被水冲走，喝了几口水才被救了上来。于是，只好用骡子来回骑渡。人多时间紧，大家又想了个办法，砍倒沿河的两棵大树，叫它倒向对岸，一下子就添了两根独木桥。几百人渡过去后，太阳已经落山了。还是苗族小战士“云贵川”捷足先登，将随身带着的长绳从上面放下来，后面的战士一个一个顺着长绳爬上去。

正当王开湘团长率领迂回部队渡河、攀登时，杨成武政委又跑到担任突击队的 6 连进行了紧急动员。6 连在连长杨信义、政治指导员胡炳云的率领

下，集结在茂密的树林里，选择了 20 名突击队员，由连长、指导员指挥，组成了突击队。

当晚，6 连突击队乘着朦胧的夜色，开始向敌人桥头阵地接近。为了麻痹敌人，6 连从正面向敌人开展了猛烈的进攻，那 20 个突击队员在连长、指导员的指挥下，以正面密集的火力作掩护，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

敌人也十分狡猾，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炮楼，有恃无恐地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战士接近桥边时，就突然投下一大堆手榴弹反击，一团团的火光在隘口翻腾飞舞。

突击队员们见此情景，急得直冒火，待敌人的手榴弹一停，又冲上去，但敌人火力十分猛烈，几次冲锋都没成功，还伤亡了几个战士。于是，战士们向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喊道：

“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从你们这里借路经过，你们别受长官的欺骗，让路给我们过去吧！”

“赶快交枪，交枪不杀，还发大洋回家！”

顽固的敌人不管红军战士怎么宣传，还是不停地打枪，投手榴弹，并吹牛说：

“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我们鲁司令的防区腊子口！”

敌人的谩骂与手榴弹的还击，激怒了红军的勇士，他们纷纷要求再次冲锋，而且立誓：“明天一定拿下腊子口！”这时，毛泽东和军团首长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问突击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毛泽东和军团首长的关怀，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杨成武和营的干部一起分析敌情：已经打了大半夜了，再用三四个钟头天将破晓，鲁大昌拥有五六个团在岷县县城，只隔着一座大山，总兵力要比红 4 团多得多，如若延迟下去，鲁部真的倾巢增援，几个钟头就能赶到，那局面将更严重，可是我们上山的那支迂回部队仍不见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还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王开湘他们一定也遇到了困难，但是眼下时间紧迫、任务逼人，不能再拖下去了。

大家统一了思想，重新组织火力与突击力量，再次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可是，接连猛攻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一个个在地上乱滚，炸裂的弹片在桥头 30 米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杨成武命令 6 连不要再继续猛攻，只进行牵制性战斗，等待迂回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发出信号后，再一起给敌人来一个总攻击。

在黑暗中，杨成武忽然听到几个战士在低声谈话：

“敌人对崖路封锁太严啦！单凭正面猛攻怕不行。”

战士们的话忽然提醒了杨成武，可不，整个 6 连正面扑上去，也很难达到疲劳和消耗敌人的目的，倒不如抽少部分同志组成突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接二连三地向敌人轮番进攻，疲惫和消耗敌人，再伺机夺桥。

于是，杨成武命令党支书记罗华生，要他与 6 连的领导一起从党团员中抽出十几个人组成突击队，其他同志仍旧原地休息。没多久，前沿又响起了红军战士的枪声和喊杀声。

午夜过去，已是凌晨 3 点，红 4 团正面攻击部队全部进入总攻位置。杨

成武遥望河对岸那边，急切地盼望着王团长发来信号，为了万无一失，让参谋长李英华指定 3 个通信员专门瞭望右岸悬崖上空。

杨成武不时焦急地看着表上的指针，4 点过去了，还不见动静。

正在着急时，6 连的通信员跑来向杨成武报告，说 6 连的突击队冲到桥下去了！杨成武立即赶到桥的附近，果真，6 连的战士偷偷地涉水过河到了桥那头。

原来，在 1 个多小时以前，当 6 连拉到后面休息时，敌人真以为红军无能力进攻了，于是都进碉堡打起盹来。6 连又组织了 15 名突击队员，他们一个个背插大刀，腰挂手榴弹，有的还配有 1 支短枪，趁着天黑，分作两路。一路顺河岸岸壁前进，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桩运动到对岸；另一路先运动到桥头，待前一路打响，就一起开火，给敌人来个左右开弓，两面夹击。

杨成武一边看着突击队勇敢冲击，一边还想着对岸山顶上的信号弹。正当万分焦虑与盼望之际，右岸高峰上面突然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紧接着又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

“王团长的信号！”战士们顿时欢腾了起来。

“发信号弹！”杨成武命令通信员。

通！通！通！接连三颗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

“总攻开始了！”战士们欢呼着，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只见 6 连的战士抡起大刀，端起步枪，在敌人中间飞舞，冲击。

右面悬崖上的部队，在王团长指挥下，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的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在敌人的碉堡里爆炸；所有的轻机枪和冲锋枪也一齐开火，直打得敌人喊爹叫娘。

晨曦晖映着大地，灿烂的朝霞中，总攻部队开始过河了！红 4 团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向隘口炮楼逃出来的敌人扫射。没用多久，红军就抢占了独木桥，控制了隘口上的两个炮楼。

杨成武见初战获胜，立即命令总攻部队兵分两路，沿着河的两岸向峡谷纵深扩张战果。

经过两个小时的冲杀，红军突破了敌人设在口子后面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夺下了一群炮楼，占领了敌人几个预设阵地和几个堆满弹药、物资的仓库，全团一边作战，一边就地补充弹药，随后向敌人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敌人也很有一股子蛮劲，退至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险要阵地后，又集结兵力，扎下阵脚，顽固抵抗，企图等待援兵到来之后一齐向红军反扑。被红军迂回部队截断的 1 个营的敌人，这时也疯狂向红军侧击。

决不能让敌人得逞，杨成武立即命令第 5 连配合崖顶上的 1、2 连，消灭这股敌人。经过连续冲锋，敌人被压到悬崖绝壁上，只好交枪投降。

与此同时，红 4 团集中了其余所有兵力向敌人的第二道阵地冲击。在红军炮火、机枪的猛烈射击下，经过 2 营近 1 小时的连续冲锋，敌人终于全部溃败了，红军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残敌向岷县方向落荒而逃！

落水的狗也要痛打，王开湘、杨成武立即命令第 2 营、第 3 营跟踪猛追。追击部队一鼓作气，连夜插向岷县，占领了岷县城东关。

甘肃之敌大为震惊，以为红军一定要打岷县城了。但次日红 4 团接到军委命令，要他们挥兵东去，乘胜占领哈达铺。

至此，腊子口一战结束。

他们真是红军啊

这里讲的是红二军团的几位伤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寻找红军部队时同人民群众打交道，得不到群众帮助和支持，心中十分苦闷而又矛盾的故事，从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军的痛恨，对红军的热爱。

1935 年，在一次战斗中，红二军团的张秀龙腿部负了伤，不能行动。组织上决定把他留在离塔卧镇 20 里左右的一个村庄里。和他一起留下养伤的还有第 4 师的两位营长唐金龙、李文清和团的青年干事刘月生。

“同志，只要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这是村里老乡们经常对这几位伤员说的话。20 天过去了，在乡亲们的热心照料下，除了唐金龙外，其他 3 人的伤已经痊愈了。于是，他们归心似箭，无论乡亲们如何劝阻，都不能动摇他们寻找部队的决心。但是，周围都是地主武装，被敌人碰上了怎么办？加之，唐金龙的伤还未好，行动不便，又不能丢下战友不管。思考再三，他们决定化装成国民党军，用担架担着唐金龙，欺骗敌人，蒙混过关。他们知道，红军是向西转移的，只要下定决心，战胜困难，总会追上部队。万一找不到部队，就到深山老林中去，拉队伍，打游击，无论如何要革命到底。

一天清晨，他们带着乡亲们给准备的干粮，同送行的人依依惜别，向西而去。这个方向是永顺、保靖。张秀龙扮成敌人的副官，走在前面。幸亏身边还有一件缴获的黄呢军大衣，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沿途，人们真的认为他们是白军，几次遇到地主武装，都未碰上麻烦。有时还受到敌人的优待，甚至有时还向敌人发通脾气。这样，他们尽管安全，却很苦恼。人民群众望而生畏，不敢也不愿接近他们。向群众打听红军的消息，群众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有次，太阳刚刚落山，他们到了一个村庄，打算问一下路再走。正好迎面来了几个年轻人，身着破衣，赤着脚，扛着扁担，往村头走。可一见他们这几个白军打扮的人，扭头便走，绕过几座房子，便不见踪影了。

在村西头，他们找到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汉。一进门，老汉就不停地说：“长官！你们该去庙宇祠堂，这里太脏，实在对不住几位！”

几位伤员明白这位老汉不愿意理会他们，这使他们回想起了早上的另一件事，他们费了许多口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人带路，可是刚走了几里路，此人就借口小便，乘机溜走了。

唉！化装成国民党军真是面目可憎，人见人恶，更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寸步难行啊！他们真想把这身老虎皮扔进粪坑里。但是为了安全，为了找到部队，只好忍辱负重把这种强烈的冲动压在心底。

晓行夜宿，四位伤员总算到了永顺县境，栖身在一个小村庄里。房东是户贫农，全家 5 口人，4 间破烂的茅草房，分前后两间，中间是一个小院。伤员刚来时，还不时听到小孩喧闹，大人说笑，院子里还不时有人走来走去。可是，待伤员们一住下，这一切都销声匿迹了，只有一个 40 多岁的家长同他们打交道。伤员们要煮饭，缸里没有水，想借水桶打水，老乡磨蹭半天才拿出来；想找碗筷，碗橱里空空如也。向老乡借，老乡便冷冷带愤然地说：“不是前几天教你们当兵弄毁了吗？现在到哪里去弄！”

听了这句话，伤员们好像莫名其妙，但立刻也就明白了——原来前些日子白军在这里，糟踏过这里的老百姓。这些事一方面使伤员感到不便，一方面又使伤员们内心感到快慰。乡亲们永远是心向共产党，心向红军，背向国民党，背向白军。他们决心亮明真实身分，并向房东打听红军的去向。

吃过晚饭，伤员们把老乡请来，先拿出一串铜钱，作为做饭的柴火费。接着，伤员们便和房东聊家常似地攀谈起来：

“老乡，这里来过红军没有？”

“来过。”

“国军呢？”

“也来过，前几天才走。”

“老乡，你看是红军好，还是国军好？”

他连着“嗯”了几声，回答道：

“我们是种田人，不管它谁好谁坏，只求有口饭吃就行

伤员们又问起他家的生活状况。他虽然很谨慎，但还是露出了底细。原来他家只有3亩田，土地革命中分得了7亩，现在又被地主收回去了。这些情况，使伤员们心里更加有底，于是他们便把藏在心里的真情话说了出来：

“老乡！你真的以为我们是国民党军吗？”

这句话，使房东惊愕了，睁着大眼紧盯着几位伤员。

“不，我们真的是红军呀！”

老乡一时显得很激动，似乎要讲什么，但马上又面无表情，欲张的嘴又闭拢了。当时，斗争很复杂，常有白军伪充红军，刺探军情和进行其他破坏活动的事发生，这不能不使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时刻提高警惕。

“我们受了伤，在群众家里刚养好，现在去寻找部队，你知道红军去哪里了吗？”

他们原来以为说出真相后，老乡一定会满心欢喜，热心相助的，谁料并非如此。忽然房东站起身来说：“我们种田人，只知养家糊口，想过安生日子，不管红军、白军，也不知红军的去向。”

房东绷着脸，说时间不早，要去睡觉了。这使红军伤员们感到尴尬，只好态度和善又十分友好地请老乡再坐一会，并恳切地说：

“乡亲呀，我们真是红军啊！”

房东只好勉强坐下了。红军伤员们撩开衣服，露出刚痊愈的伤口，又指着一旁的担架，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可房东仍是不说话，只是用眼睛反复地扫视着这几位有点可疑，似乎又可信的人。

突然，房东转眼盯着伤员们那简单的行装。不知什么时候，包裹开了口，恰好露出顶红军的八角帽。房东睹物生情，眼睛一亮，喜形于色地喊道：“同志！你们真是我们朝思暮想的红军啊！”

房东快步跑出门，把老婆、儿子、儿媳、小孙子都领了进来。刹那间，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大人忙着赔不是，并问候苦辛，还诉说红军走后，白军到此抢掠和欺压村民的罪行。小孩也爬到红军伤员的肩头，亲切地喊着“红军叔叔好！”女主人还忙着生火做饭，像对待客人一样招待红军伤员。

接着老乡又高兴地对红军伤员说，贺龙的红军部队就驻在西边不远的毛坝，离这里不过50多里，前几天还刚刚打了一个胜仗。这位房东，当夜又为红军伤员赶赴毛坝送信。第二天下午，在老乡的帮助下，红军伤员们终于又回到了离开月余的部队，重新开始了紧张、残酷，而又愉快的战斗生活。

能上能下

“以革命利益为重，服从组织，能上能下，是兴初同志所具有的可贵品

质。”这是梁必业同志为同他并肩斗争、工作多年的梁兴初将军所作的评价。

梁兴初将军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到师长、军长、军区司令等职务，都曾担任过。其间，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曾几次从高一级职务上降下来，担任低一级的职务，然而，每次他都能以革命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并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935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入甘肃之后，部队进行改编，组织上决定调红 2 师 5 团任营长的梁兴初到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任连长。梁兴初很快到任并积极地开展工作，他和连指导员曹德连立即带领全连出发去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1937 年 1 月，梁兴初曾离开战斗部队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同年 8 月 25 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 115 师。此时军政大学正在南迁，在甘泉北面的劳山镇，接到前方八路军总部电令，要求学员提前毕业，奔赴前线。第二天，梁兴初领到一张毕业证和一支步枪，就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晓行夜宿了八九天，东渡黄河，来到侯马追上了部队。早在 1935 年 10 月就任红一军团 2 师 2 团团长的梁兴初，被任命为第 115 师第 343 旅第 685 团 3 营营长。梁兴初二话没说，愉快服从，跟随部队奔赴晋东北前线，9 月下旬即率领全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斗。

陈云最早撰文报道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并不是事先有一个完整的行军和作战计划的主动行动，而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陷入被动以后，为争取恢复主动地位的一个战略行动。1934 年 10 月 10 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了红军撤离苏区，开始转移的命令，16 日先头部队就出发了，可以说作出决策和行动都十分仓促。

这次转移又是十分秘密的，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行军距离有多远，以后还回不回到中央苏区，连当时的军团领导人都不知道。中央军委也只是打算转移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无长远打算。

正是由于保密的缘故，对红军转移（长征）的动员不成熟，宣传又少，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摧毁，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各苏区的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不知道红军究竟怎么样了，自己的亲人怎么样？一点信息没有，忧心忡忡。

长征开始以后，又与共产国际中断了无线电联系。中央机关行止不定，交通不便，又要保密，书信和人员往来也中断了。中共中央得不到共产国际的信息和指示，共产国际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这支革命队伍怎么样了。

国内和国际上正义的人们，也十分关注着中国的形势，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怎么样了。

国内外人民的关心，当时只能通过国民党政府掌握的宣传媒介得到一些令人扫兴的消息。他们大肆鼓吹“围剿”的胜利，称朱、毛领导的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宣传辉煌的胜利，他们对红军总也消灭不完。人们很自然对国民党军的“胜利”产生怀疑，但是怎么也弄不清事实真相。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一方面领导红军发挥自己的优长，

英勇作战。另一方面也感到有必要把红军的正义、英勇的行动，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支持。

1935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同志赴莫斯科，作为中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代表中共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长征时是中央派往红军红五军团的代表，他帮助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指挥所部打了许多漂亮仗，对红军战略指导上正误得失非常了解，也熟悉长征中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并参加了遵义会议。所以他是常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理想人选。

陈云经过辗转波折，于 1935 年 8 月 20 日到达莫斯科，那一天正好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代表对中国的苏区、红军的情况十分关注，对他的到来都十分高兴和欢迎，大家急切地想知道盼望已久的消息，陈云简要地介绍了情况，代表们对他的到来和介绍的情况十分高兴。

为了让各国共产党和世界更多的关心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壮举，他于 1935 年秋写出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1936 年初发表在巴黎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面月刊》上，不久就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

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央红军指战员们坚毅不拔、克服困难、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指挥灵活、战法巧妙，从而创造了许多战争史上的奇迹。文中还介绍了红军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的坚定革命意志，谦虚朴实的作风，充满智慧的指挥艺术。文章对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指战员表示了崇敬、赞美的情意。

为了使文章既能在国外发行，回答共产国际和各国人民所关心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情况，也同时还要使这篇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回答各苏区和全国进步人士对红军的关心，揭露敌人的造谣，陈云同志以廉臣为笔名，表述的方式是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的军医身份陈述。

1936 年 2、3 月间，陈云又以施平的笔名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英勇西征》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前的形势、预见和准备工作。例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为推动抗日工作，减轻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于 1934 年 7 月就派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于 7 月 7 日从瑞金出发，首先进逼福州，尔后转战于闽、浙、赣、皖地区。还介绍了任弼时、王震、肖克率红六军团西征湖南中部，创建新的苏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证的情况。还介绍了红军进行干部训练，扩充兵员，补充军需物资和弹药的情况。

关于红军在长征中克服严酷的自然条件的困难和冲破敌人的层层阻截，击退敌人的尾追，也作了充分的阐述。文章高度赞扬了红军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这篇文章发表得及时，用生动的事实，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介制造的各种谣言，使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对红军的长征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真实的了解，从而赢得了更多的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支持。

徐海东布阵劳山

1935 年 9 月 7 日，红 25 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豹子川。鄂豫陕省委在此开会，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

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全军总共 3400 余人。军领导对部队作了进入陕甘苏区、同陕北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整顿好军容，讲究礼节，遵守纪律，注意团结，虚心向兄弟的陕北红军学习。全体指战员都感到无比兴奋，信心倍增。

9 月 9 日，部队进至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陕甘党组织的习仲勋、刘景范，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西北工委。

红 25 军在永宁山稍作休整后，经过 4 天行军，于 9 月 15 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至此，红 25 军经过 2 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 4000 余里，沿途攻克了 3 座县城，进行大小战斗 10 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胜利完成长征。

红 25 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后，9 月 16 日，陕北革命的创始人刘志丹，率领红 26、27 军来到永坪镇，和红 25 军胜利会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统一领导和指挥作战，9 月 17 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组建红 15 军团。

18 日，在永坪镇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 4 周年。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着“欢迎红 25 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洋溢着两支兄弟红军亲如手足的战斗友谊和根据地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烈感情。

联欢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先后讲话，分别代表陕北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红 25 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祝贺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 3 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在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红 25 军、红 26 军、红 27 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郭述申为副主任。下辖 75 师、78 师、81 师。75 师由红 25 军编成，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78 师由红 26 军编成，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81 师由红 27 军编成，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军团机关和直属队编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部长查国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手枪团、补充团、交通队。全军团共 7000 余人。

红 25 军和红 26 军、红 27 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红十五军团的建立，对粉碎敌人第 3 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十五军团乘敌军尚未全部展开，南线敌 67 军冒进孤立之际，决心挥师南下，首先给该敌以有力的打击。

当时，延安有敌东北军两个主力师——67 军 110 师、129 师及军直特务营，外加地方武装，实力比较强。根据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状况，若强攻延安显然不行。

别看徐海东从前仅是个烧窑的泥腿子，经过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加上他善于总结战斗经验，此时已成为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他提出：“把敌人调出来打”。

政委程子华十分赞同，分析道：

“延安这么多的敌人，不能没有补给；如果用一支部队围攻甘泉守敌，切断敌人的南北交通线，必然能引蛇出洞，诱敌前来增援甘泉。”

一个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决心定下来了。

在什么地方围歼敌人呢？

陕北的“活地图”、刘志丹副军团长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设伏区——劳山。

劳山镇距延安30公里，南距甘泉约15公里，是延安至甘泉的必经之地。这里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绵延近15公里，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从延安向南直通甘泉的公路，在一条狭窄的川道里，两旁山峦相距约200多米。东山高，山上遍布茂密的林木，荆棘丛生，无路可走，人畜都难以通过；但靠近公路有些高地，林木比较稀疏。西山较低，山上有庄稼地，地里谷子已经收割，山坡上光秃秃的，但有小山沟可以隐蔽。公路旁还有一条由北向南流入洛河的小溪，宽、深各1米。

根据对劳山地形的分析，军团首长决定在大劳山至白土坡摆下一个“口袋阵”。“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九沿山，此山最高点为1325高地，距延安约20公里；九沿山以南便进入劳山山区。劳山最高点没有超过九沿山的。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在大、小劳山之间，不使其接近甘泉城，与甘泉守敌会合，红军将“袋底”设在甘泉城北5公里处的白土坡。“口袋”全长约12公里，也就是整个劳山地区。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签发命令：

75师埋伏地在劳山北段之东、西山，负责扎“袋口”，堵截敌人逃回延安的退路和阻击后援之敌。只有等敌人全部通过九沿山，进入红军伏击区后，才能开始行动。除向北派出警戒部队外，迂回部队在敌后跟进，以“袋底”打响为号，前堵后截，左右夹击，把敌人全歼在“口袋”里；

78师各步兵团在大劳山南段西山一带隐蔽设伏，打响后全力以赴把敌人压回大小劳山村沟道内；

骑兵团在劳山地区中段东侧之土黄沟、芦家村一带隐蔽，打响后乘马出击；

81师佯攻甘泉城，并在“袋底”前一线阻击延安来援之敌，不准其接近甘泉城。

9月28日，81师241团、243团控制了甘泉城外各制高点。243团占领城周围的太皇庙、太平梁、墩儿山，开始包围甘泉城。师部和241团驻甘泉城西北的关家沟，距甘泉城约3公里。29日，241团主力按预定部署进驻洛河川、关家沟一带集结待命。

28日佯攻甘泉开始后，军团首长分析，3天内延安敌军就会派出援兵。这期间，军团各部队进行了战斗准备，尔后向伏击地域开进、集结，并适时展开。为了不让敌人发觉，军团严格战场纪律，立即封锁消息，不准随意走动，保持高度静肃；规定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枪。

徐海东等军团首长真是料敌如神。第三天，即1935年10月1日，敌人果然出动了。敌110师在师长何立中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南下增援甘泉。

途中，何立中把630团留在四十里铺作为接应。

何立中对于红军的战术也有一些研究，他知道红军善于打伏击，前面九沿山山高路险，连绵4公里有余；公路两边山岩陡峭，林木茂密，是个设伏的好地方。所以，何立中率领部队通过九沿山时十分谨慎。他先派628团裴焕彩部从公路两侧爬山越岭，仔细搜索；确知九沿山无红军埋伏后，才命令

全军通过。

但何立中还是失算了。

何立中以为红军只会在九沿山设伏，既然如此险要之地没有红军的影子，前面没有比这再高的山，那就别无顾忌了。因而他轻松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范驭州说：

“龙潭虎穴已过，不会再钻进共军的口袋里去了。”

看看时间，刚过午后，何立中原定在这里宿营，次日再进甘泉；他看时间尚早，距甘泉剩下不过 20 公里，便改变计划，继续向甘泉前进，早日解甘泉之危，好在上司面前邀功请赏。于是下令把原来的 1 路纵队改为 4 路纵队，缩短队形，加快速度。公路两旁，也不再派兵搜索了。这时，敌 110 师的行军序列是：628 团为前卫团，中间是何立中和师直属队，后卫是 629 团。

10 月 1 日早饭后，上级通知红 81 师，延安的敌人出动了，正向甘泉前进。军团首长命令 81 师留下 1 个团继续包围甘泉，另 1 个主力团从正面打击来援之敌；并特别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白土坡一带把敌人堵住，否则，延安援敌与甘泉敌人会合，我军就失去了战机。

根据军团首长指示，241 团把包围甘泉的阵地交给 243 团，并于战斗打响前 1 小时，立即从关家沟出发，沿一条山间小路向甘泉城北 5 公里处白土坡的庄子沟内隐蔽集结。

白土坡在西山之侧，距关家沟约 3 公里，临战前准备完毕之后，徐海东军团长和 81 师首长亲临 241 团阵地，又对团指挥员当面作了指导，徐海东要求他们：

“不论碰到什么情况，打响后，立即从庄子沟出击，严密封锁川道，决不能让敌人突破我军的防线；并向敌人不断实施反冲击，把敌人前卫部队压回到小劳山以北。只要坚持一两个小时，其他埋伏的兄弟部队便能对敌人形成夹击。如果让援敌与甘泉守敌会合，我军这次伏击战的整个部署便失去了意义。”

徐海东再三强调，241 团的任务完成得如何，是关系到能不能打赢这一仗的关键。最后，他严肃地问 81 师师长贺晋年：

“能不能完成这个艰巨光荣的任务？”

贺晋年毫不犹豫地回答；

“坚决完成！”

下午 2 时，敌人进入 241 团阻击地段。贺晋年等人在山上观察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分析着敌人的行军队形和速度。

110 师的纵队虽然拉得很长，但队形比较密集。他们从早上出发，已经走了 30 多公里，并且顺利通过九沿山至大劳山（劳山镇）地段，因此骄气十足，有些得意忘形。

为了保证堵住敌人，241 团 1、2、3 营都部署在白土坡西面的西指挥所西侧。

敌人的尖兵过后，一个骑马的军官带领着前卫营在尖兵后懒洋洋地跟进。

这是打响战斗的最好时机。

241 团以鸣枪为号，突然开火，顿时，枪声、冲锋号声、以及指战员的喊杀声，震撼着远山近谷。241 团猛虎般冲出庄子沟。

敌群像被捅乱了的马蜂窝，互相挤压、碰撞；其前卫营一小部，冲过公

路上的小桥，逃向甘泉。余敌被红军压进川道里，并堵住了其前进道路。

此时，红 78 师骑兵团也由劳山北的阳台迅速出击，协同 75 师断敌退路，迫使敌人的后续部队被压缩在小劳山附近。

至此，敌人完全陷入红军的包围之中。

何立中马上清醒了过来，立即将后续部队展开，抢占公路两旁东西山头，居高临下用猛烈火力压制红军冲上公路的战士，企图用多于红军数倍的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死里逃生。

敌人进行疯狂反扑，集中力量攻击红军阻击部队，子弹、炮弹像暴风骤雨泼洒到 241 团的阵地上，同时组织兵力反复与 241 团争夺公路两旁的高地。

贺晋年师长正手举望远镜观看整个战场形势，忽然看到敌人一部正在抢占小劳山对面的几个山头，便直接命令 241 团 2 营夺回来。战斗打响后，军团政治部的两位负责同志跟随着 2 营，有力地促成了这一战斗行动。

奔向东山的 2 营，打得机智灵活，绕过了几条山沟，首先与敌争夺 1212 高地，把敌人压下去，堵到小劳山村东山，敌多次反攻，想打开通路，但均未成功。尔后，2 营又越过一条山沟，将敌堵在小劳山正对面的东山一个山头上；但红军多次组织进攻，均遭到敌人顽抗。

战斗进入白热化，川道里敌我形成对峙。

由于东、西山仍有部分山头被敌人控制着，因此对红军正面堵击的部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如飞蝗般的子弹，把庄稼地里的小麻秆叶子都打光了，只剩下一些光秆。

但是，英雄的红军指战员越战越勇，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屏障，让敌人的血染红公路旁的溪水，让敌人的尸体在公路上堆成一座座小山！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敌人从占据的几个山头上发射的猛烈火力，打得川道里我阻击部队指战员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241 团的七八个营、连干部相继负伤或牺牲。自 241 团成立以来，一次战斗中伤亡这么多干部还是第一次。

2 连长栾新春，真不愧是好样的，肠子都打出来了，仍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2 连只剩下 1 名班长和十几名战士。栾新春被打扫战场的战士找到，送到医院后牺牲了，年仅 18 岁。

这时，东、西山的争夺也十分激烈。在这严峻的时刻，81 师贺晋年师长把师部人员和传令队组织起来直奔西山。因为这边山头敌人的火力最强，对红军威胁最大。不一会，刘志丹副军团长也来到了这里。

刘志丹、贺晋年两人的警卫员张有才、阎应娃，都中弹牺牲了。

东山那边，2 营正同敌人鏖战。川道里，241 团政委继续指挥 1 营和 3 营部分连队进行阻击。团长亲自率领 3 营的 1 个连与 1 个排上了东山的 1212 高地。敌我之间展开了拼死的搏斗。经过反复争夺，2 营营长重新组织火力，亲自带队攻击，终于攻上了山嘴，把敌人压到小劳山村。

时近傍晚，西山传来阵阵手榴弹的爆炸声和闪闪的火光。81 师贺师长与 78 师杨森师长取得联系，从西侧也把敌人压到村里来。

241 团团长率领 3 营一部，经过 3 次进攻，终于拿下 1212 高地，从东山把敌人压了下来。

高地终于被红军占领了，敌人都被赶到了山道里！

这时，红军各部嘹亮的冲锋号声在山谷间响起，山鸣谷应。75 师由敌人

背后积极向小芳山攻击前进；78 师由西山向下打；81 师 241 团 2 营和 3 营一部从东山上打下来，另一部从西山阵地侧面攻击，川道里找正面堵击部队向前推进。

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人全部被压缩在小劳山西南的一条山沟和小劳山村，天黑前，被全部歼灭。

再说敌 110 师师长何立中，当他的部队在劳山地区中了红军埋伏之后，马上电令留驻四十铺的 630 团，疾驰劳山援救，但敌 630 团团长李东坡，并不听招呼，他害怕“有去无回”，按兵未动。何立中再电催促时，李东坡只把部队向前移动了一下，表示“服从”命令后，又缩回四十里铺去了。

劳山伏击战从 10 月 1 日 14 时打响到 20 时左右结束，经过 5 个多小时激战，毙、伤、俘敌 3700 多人。敌师长何立中负重伤抬到甘泉不久就死了，敌师参谋长范驭州被当场击毙，敌 628 团团长斐焕彩被生擒，629 团团长杨德新（给张学良当过副官），觉得回去无颜再见张学良，自杀而死。缴获战马 300 余匹，75 山炮 4 门，82 迫击炮 8 门，重机枪 24 挺，轻机枪 162 挺，长短枪 3000 余支，无线电台 1 部，以及其他各种军用物资不计其数。

劳山战斗后，我 15 军团乘胜南下，于 10 月 25 日，又全歼榆林桥守敌 107 师 4 个营。就这样，南线敌 67 军所发起的战役攻势，基本上被粉碎了。

劳山、榆林桥战斗，是红十五军团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作战行动，是献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见面礼。它是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 3 次“围剿”进行的重要战斗之一，不仅巩固了陕甘苏区，并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而且为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为下一步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创造了条件。

谁敢横刀立马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六言诗，名为《给彭德怀同志》，是迄今为止在《毛泽东诗词选集》中，人们见到的唯一的一首六言诗。这首诗短小精练，情景交融，畅达自然，寓意深刻，音韵铿锵，脍炙人口。它是一首言情的祝捷诗。

1935 年 10 月 19 日，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的刚由红一方面军改编不久的陕甘支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县境以战国名将吴起命名的吴起镇（今吴旗镇），将要与陕甘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

部队刚进驻该镇一天，国民党军驻宁夏、甘肃的马鸿逵、马鸿宾部不甘心六盘山下被红军歼灭一个团的失败，又派出骑兵部队向红军追来，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给予突然打击，以阻止中央红军与陕甘苏区红军的会合。

这时，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一路转战，只剩下 7000 多人，且已十分疲惫。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斩钉截铁地定下决心，决计不能让追敌进入苏区。

为了消灭这部分敌人，彭德怀亲赴前线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布置伏击。21 日晨，红军一举打退敌人的先遣骑兵团。敌人又以 4 个团的兵力迅速扑来。彭德怀镇定自若，指挥部队分头迎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人仰马翻，弃尸遍地。激战至当天下午，全部击溃了敌人。这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最后一仗，保证了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的胜利会师。

毛泽东得到战报后，喜形于色，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不朽的诗篇赠给彭德怀。彭德怀看到诗后，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将原诗送还给毛泽东。从而，可以看出身居高位、屡建战功的彭大将军的心胸是如何的宽广，态度是如何的谦逊！

1947 年 8 月，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举歼敌 6000 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和胡宗南企图将解放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毛泽东欣闻这一胜利，当即又把这首诗写给彭德怀，最后一句仍然是“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今天已被人广泛传诵，成为不仅是对当年彭德怀，也是对其一生的生动写照和高度评价。

要走一步想三着

1935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作出决议。会后，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右路军由中央、中央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主要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则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并决定左右两路军分别经阿坝、班佑通过草地，占领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相机发展。

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以后，张国焘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并指挥部队向川、康边境退却。对此，朱德多次规劝和纠正，张国焘都置之不理。其间，朱德除了在会议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外，还在会下做着他的工作。希望张国焘能回心转意，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一次，休息之时朱德和张国焘下象棋。开局之后，双方对阵，张国焘一开始就贪吃鲁莽，不顾战术和全盘，结果时间不长就连输了三局，第四局开始时，朱德稍加思索后，计上心头，只见他步步后退，越走越糟，使自己的老将陷入对方的众兵包围之中，结果输了这一局。此时，只见朱德不慌不忙地说：“看来下棋也同打仗一样，我刚才输就输在不该步步退却，落入你的包围之中”。张国焘也马上听出了朱德的话外之音。便强词夺理地说；“哈哈！朱老总你可不能这样说。比如我们南下不是胜利了吗？前进了 1000 多里，夺取了好几个县城，这难道是失败吗？”显然，张国焘还为南下以来取得的几个小胜利而昏着头，没有充分看到部队面临的局势。于是朱德又耐心地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上早就讲过的。前三局你输，主要是输在了贪吃几个小卒子的问题上，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要走一步想三着，从全局上看，照顾全局，用战略眼光看问题。”朱德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语气加重地接着说：“带兵打仗，也和咱俩下棋一样，不能只看眼前打了几个小胜仗，占领了几个小县城。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前进了 1000 多里，却没有把敌人主力消灭，我们只不过是把敌人赶跑了，有的是敌人自己主动退出的。我们南下，反倒把敌人打得更集中了。把四川的军阀打得都集中起来了，北面胡宗南也来了，云南滇军也来了，听说蒋介石还要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出来进攻我们，我们腹背受敌，难以招架呀！”张国焘被说得无言以对，尴尬地站起身就走。

朱德在与张国焘一起工作期间，坚决地抵制了他的错误，力挽狂澜，反对分裂，维护了红军的统一和团结，最后终于率部北上，促成了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党在尔后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作出

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曾称赞朱德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毛泽东扶他上担架

1935年11月21日拂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从北、南两个方面对直罗镇之敌牛元峰部展开猛攻。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异常慌乱，像一窝蜂似的，左冲右突，均不得脱身。激战中，游好扬等人负了伤。当时敌人还在拚命反击，侧射火力很猛，担架一时上不来。同志们把游好扬等几位伤员暂时安置在散兵坑里，等待送往后方医院。

阵地上的烟雾慢慢散去，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抹红了远方的天空。枪声已移向别处，远远地可以看到一群群俘虏被押着走下战场，有的用棉衣裹着脸，有的一瘸一拐，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这时，一个趴在散兵坑沿上的轻伤员，突然兴奋地高喊：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在哪里？”游好扬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快朝山下面看嘛！”他情不自禁地说。游好扬吃力地抬起身子，伸长脖子往下看：可不是，毛泽东主席穿着青布衣服，顺着山路大步向这边走来。后面是周恩来副主席和罗瑞卿局长等。他们一边走，一边察看着枪声未息的战场。

这些伤员中间，大多数没有见过毛主席，所以都昂头期待，嘴里还小声地说着什么。看见毛主席急切地向他们走过来，都想站起来去迎接，可是伤口疼得很厉害。毛主席见状抢先两步走到伤员面前，挨个察看了伤员的伤情，慈祥地安慰着伤员。说担架队一会就上来，要伤员到医院安心养伤，不要惦记着前方，伤好以后仗是有的打的。其他几位首长也是不停地语重心长地安慰着伤员。游好扬负伤后，情绪有些烦躁，经毛主席、周副主席一番温暖亲切的谈话，心里顿时安稳了许多。其他几个伤员的脸上，也带着甜蜜幸福的微笑。

同志们都在和毛主席亲切地交谈，游好扬很羡慕，也想同毛主席说几句心里话，可是因为喉咙受伤，一张嘴伤口就流血。毛主席看游好扬想讲话的样子，急忙摇摇手，不让游讲话。幸好有个同志心直口快，把游好扬要说的话讲了出来：

“毛主席，前面还在响着枪，您怎么就到这里来了？”“怎么，只许你们到前面来吗？”毛主席笑着看着周恩来和罗瑞卿等，风趣而又幽默地说道。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谈话中间，毛主席吩咐人去叫担架，又取下自己身上的军用水壶，把水倒在一只小杯子里，逐个喂伤员水喝。因为游好扬靠近毛主席，所以喝到的是第一杯。毛主席一手拿壶，一手拿杯，俯下高大的身躯，将水送到伤员嘴里。伤员们刚负伤不久，最需要的一是止痛，二是开水。游好扬由于喉咙受伤，嘴里的唾沫早就咽干了，口渴难忍，时刻在盼望着能喝上一口水。眼下，见毛主席把水送到了嘴边，恨不得一口把它喝干，可是嘴唇刚碰到杯子，他看毛主席干裂的嘴唇，不由得迟疑起来。毛主席看出了他的心思，像哄小孩似地催促道：“快喝吧，喝点水会舒服些啊！”游好扬看看罗瑞卿，他微笑着点点头。游不忍谢绝毛主席这慈母般的爱意，把一杯含着感激热泪的清水咽下肚去。接着，毛主席又逐个把水送到伤员嘴边，直到大家都愉快地喝下

去为止。这时，毛主席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一会，担架队到了。由于部队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到达陕北不久，物资十分匮乏，担架都是用硬邦邦的木板钉的。毛主席看了皱皱眉头，便对担架员们说：“来，咱们去检点东西铺在担架上，让伤员们躺得舒服些。”说罢，他和其他首长及担架员一块到附近小树林里，捡敌人丢弃的破大衣和破被子，拾了一些枯树枝。

伤员们在散兵坑里，看着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罗局长为自己忙碌，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都埋怨自己不幸负了伤，让毛主席跟着操心受累。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抱着一抱东西回来后，亲手在担架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大衣和被褥，比伤员平常睡觉的铺位还松软。然后，毛主席和首长们把伤员扶起来，搀到担架上。又给伤员盖上大衣，插上伪装树枝，对担架员说：“走吧，小心，走慢些！”担架变成了温暖的摇篮，伤员们舒适地躺在上面，心里涌起幸福的波澜。

担架顺着山路缓缓离去，毛主席和几位首长向伤员们招手告别。伤员们挣扎着抬起身子，只见一轮红日当空，满山遍野沐浴着一片阳光，陕北大地也和红军指战员们一样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毛主席、周副主席和首长们，站在巍巍的山巅上，目送着伤员们渐渐远去。

刀下留人

毛泽东到达陕北根据地，就听徐海东和陕北苏区干部群众对肃反情况的反映，得知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感到非常震惊。毛泽东同志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为了及时控制事态发展，党中央立即派王首道等人到瓦窑堡处理这件事。在去之前，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王首道等本着要“慎重处理”的方针，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刘志丹等同志的“问题”弄清楚了，原来是推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寻人以莫须有的诬陷加给刘志丹的“富农主义”、“投降主义”等“罪状”。毛泽东同志听了汇报，立即下令释放刘志丹等同志。

刘志丹被释放后，周恩来首先接见了他，并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和鼓励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听了毛主席的话，感到浑身热血奔涌。这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失败中从不叹气，在严刑拷打下眉头不皱的硬汉子，此刻却忍不住双眼有些湿润了，过了一会儿，他擦了擦眼里的泪花，轻轻一笑，回答说：“我以前坐过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周恩来同志指着刘志丹脚脖子上被脚镣勒下的深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志丹同志呀，你吃亏了嘛。”

刘志丹忙缩回脚，腼腆地说：“没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又说“主席、副主席，你们在长征中那才吃了很大的苦，来到陕北，条件又不好。”

毛泽东笑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

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刘志丹说：“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同志连忙摆了摆手说：“不，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感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刘志丹听了毛主席的话，很激动，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信任。”

不久，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 28 军军长、红军北路总指挥和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重要职务。1936 年，刘志丹奉命渡过黄河东征，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牺牲。周恩来亲自扶柩，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瓦窑堡。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刘志丹同志光辉的一生，称颂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各路红军长征出发地点时间

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是根据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次形成的，因而各路红军没有统一的出发时间和地点。

在“左”倾军事路线的指导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到 1934 年夏季，中央苏区已由纵横各千里缩小到纵横各 300 里，敌人重兵压境，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进逼，战场形势十分危急。1934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共产国际的李德，决定利用全国人民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涨情绪，与冯玉祥领导的长城抗战和绥远、热河抗战相呼应，派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支援四省的革命斗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减轻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他们当面向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交待任务，要求他们休整三四天后出动，半月内赶到皖南，并携带中共中央关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宣传品 60 万份，沿途宣传。军团领导人受命以后，立即抓紧准备，补充新兵 2000 余人，全军团总兵力 6000 余人，分编为 3 个师，还有中央 1 个随军工作团，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于 7 月 6 日从瑞金出发。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对严重的军事形势没有及时做出战略转变，红七军团向闽、浙、赣、皖出动以后，7 月下旬，又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 3 军取得联系。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按照上述命令，要求红六军团突围西移，成立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西移行动。军政委员会决定：红六军团主力在敌人兵力比较单薄，空隙较大的湘军和粤军接合部，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桂东地区转移。经过充分准备，红六军团所辖红 17 师、18 师和红军学校共 9700 余人，于 8 月 7 日从遂州、横石出发，突破敌人两道封锁线，于 11 日到达桂东以南，正式成立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红六、红七军团的战略行动，并没有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形势越来越严重。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不经中央

政治局讨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以求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他们命令红 24 师和地方部队 1.6 万人接替主力红军的阵地防御任务，留项英、陈毅指挥，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命令主力红军向雩都以北瑞金、古城地区集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中央红军 5 个军团和直属部队共 8．6 万人，于 10 月 10 日从瑞金和雩部（今于都）出发，10 月 17 日渡过赣水，进行伟大的长征。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坚持在大别山区斗争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于 1934 年 11 月 11 日做出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 28 军，坚持鄂豫皖地区的游击战争，省委率红 25 军向平汉路以西转移。红 25 军奉命后进行了政治动员和整编，撤消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 3 个步兵团、1 个手枪团共 2900 余人，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于 11 月 16 日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越过平汉路，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进入桐柏山区。以后又进入川陕交界地区，积极活动。

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以后，发展很快。1935 年 1 月，广昭战役胜利以后，接到中央和军委 1 月 22 日电报称，中央红军拟于 2 月进至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向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行动。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收拢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率领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调查水文情况，根据敌人防御特点和兵力部署，选择渡江地段和制定作战计划。明确各部队任务后，还组织操船、泅水等技术训练，演习登陆突破，巩固登陆场和向纵深发展等战术行动。3 月 28 日夜，红 30 军红 88 师部从和总部教导营，从苍溪塔子山附近，以神速动作秘密渡过嘉陵江，抢占了登陆场，后续部队迅速跟上，共以 5 个军 11 个师 33 个团 8 万余人，参加了嘉陵江战役。从此，第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

长征最后出发的是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到达湘西后，与红二军团会合，取得了连续作战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于 1935 年 9 月调集 130 多个团向红二、六军团围攻，企图将其消灭在龙山、永顺、桑植之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决定，以红 18 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主力采取逐次转移的方法，进入湘中，然后向湘黔边转移。于是各部进行了政治动员，筹措粮食，安置伤员，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将地方部队和红五师、红六师分别编入红二、六军团，使两军团各辖 3 个师，总兵力达 1．7 万余人。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六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主力由桑植县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到敌人银行里取款

主力红军长征后，闽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其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起。在远离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情况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坚持了革命阵地，为抗日战争准备了条件。

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区军民的手段是极其毒辣和残忍的。他们经常以十几倍、几十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对游击区进行连续的“堵剿”、“追剿”、“驻剿”、“搜剿”，来限制和消灭红军游击队。他们在“宁肯错杀千人，不能漏掉一个”的反动口号下，实行所谓“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

十家同祸”的连坐法，凡是所谓“通匪、窝匪、济匪等，都格杀勿论”，成千上万地屠杀共产党员、干部和农民骨干，企图釜底抽薪，彻底摧毁苏区，使红军游击队无法继续立足生根。各地恶霸地主，趁机组织反动民团向革命群众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敌人的暴行，给红军游击队和人民带来了数不尽的痛苦和灾难。许多游击队，不得不经年累月的忍受着风雪饥寒，转战于穷山绝岭。粮食给养得不到补充，野草、山果、野味成为部队的主食，山洞、树荫下成为栖身之所。尤其是药品奇缺，伤病员全靠采集草药治病疗伤，还要同毒蛇猛兽作斗争。虽然形势是严重的，斗争是艰苦的，但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始终不怕苦，不怕死，机智顽强地坚持斗争。下面要说的闽粤支队，到云霄城敌交通银行取款的故事，仅是其中的一个生动事例。

眼看 1935 年的冬天来临了，坚持在闽南的红 3 团，棉衣还没有着落。这时，敌人正集中兵力向坚持平和一带的红军主力进攻，对闽粤支队有些放松。于是，闽粤支队决定乘机袭击云霄城，解决一些经费。

云霄城位于福建省的最南部，东临大海，南接广东，城里驻有敌人一个保安团，战斗力不强。另外还有国民党的一个交通银行。银行经理，是个罪大恶极、群众恨之入骨的恶棍。红军游击队打击的目标就确定为交通银行。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是爱财如命的，打了它的银行等于要它的命，一定要调兵回来保驾。这样，既可以弄到一笔钱，解决冬装，又可以达到配合红 3 团主力粉碎敌人进攻的目的。

支队决定化装奇袭。从全支队挑选四五十名精悍的班、排干部和战士，组成了一支便衣队，由支队长卢胜率领进城，其余的部队由政委率领，埋伏在离城七八里远的甘蔗地里和稻田中，如果敌人出城追击，便打它个措手不及。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通往云霄城的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着柴，提着篮，络绎不绝。红军便衣队，有的把驳壳枪插在柴草捆中，有的放在篮子里，扮成“阔佬”的就干脆大大方方地捌在腰里，一行人夹在人群中，大摇大摆地向云霄城走去。

也许因为云霄城在闽南属敌人的要地，红军游击队很少在此出没，所以岗哨没有严格盘查，就放行人进了城。

一进城，便衣队便在向导的指引下，由陈连长带领一部分人，秘密地包围了交通银行。其余的人，分散在银行周围，夹在赶集的人群中，很快占据了街头巷尾的有利地形，控制着进出道路，监视敌人的行动。假如一旦被敌人发觉，便强行掩护陈连长他们完成任务，并顺利撤出县城。

云霄城像往日赶墟逢集一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战士们有的摆开了柴摊，同老乡们讨价还价，但是每个人的眼睛都在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卢胜选择了一个便于指挥的隐蔽街口停下来，仔细观察了四周的环境，心里着急，盼望着时间快一点逝去。

这时，远远看见陈连长一会在这个小摊上看看，一会到那个小摊上搭讪几句，慢慢朝卢胜走来。

“啊，赶集来啦！好久不见啦！”陈连长走到卢胜身边，像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和他的上级打着招呼。卢胜也大声地寒暄了几句，两人便并肩向一条行人稀少的胡同走去。

“支队长，恐怕斧头治不了保险柜！”陈连长小声地说。

这个问题出发前就研究过，计划先找经理和出纳，强迫他们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如果找不到他们，就用斧头劈开保险柜。这两个办法实行起来都有困难，可是谁也再找不出更合适更稳妥的办法。卢胜压低声音对陈连长说：

“派人在银行门口盯着，注意有没有人叫‘经理’，叫‘出纳’。如果有，就把他的模样记住，一动手就先捉住他。如果盯不到，那就强找，只要能找到，枪口对着它的脑袋，看他敢不交出钥匙来！”

陈连长点了点头，又交谈了几句，便告别卢胜，缓缓向银行走去。

陈连长走后，卢胜一看表，呀，8 点多了。太阳也升起老高了。刚才还嫌时间过得太慢，可现在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担心找不到经理和出纳。

忽然，赶集的人乱跑起来，声音嘈杂。卢胜正感到奇怪，通信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有个同志买东西，不小心，一弯腰枪掉了下来，老百姓一见此情景就轰动了！”“盯到了经理和出纳了吗？”卢胜急切地问。“还没有！”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卢胜神情更加紧张起来。他一看表，还不到 9 点钟，规定的行动时间还没有到。这时，政委带的队伍，还没有做好准备。可是，秘密已经暴露，敌人将很快采取行动。假若不立刻动手，那就有可能打不到狐狸，倒惹一身臊。于是，卢胜急忙命令通信员：

“告诉陈连长，马上动手。一定要把经理和出纳找出来，一定要把钱拿到手！”

通信员穿过人群迅速跑了回去。大街上，人们到处你拥我挤，呼唤着自己的亲人，向城门口慌慌张张地跑去。卢胜立即向周围的同志发出准备战斗的暗号，并占领了十字街口的一座小楼。当赶集的人差不多散光的时候，游击队就把满街的柴禾捆堆放在路口上，构成了一道障碍。然后在楼的窗户口上端着枪，警惕地注视着敌人动静。

不一会，远远一队敌人，荷枪实弹，沿着大街向十字街口跑来。卢胜正在担心陈连长他们拿没拿到钥匙时，通信员跑来兴致勃勃地报告说：“成了。钥匙拿到手了！”

卢胜一听通信员的话，悬着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急促命令道：“通知陈连长，马上按预定计划向西北城门转移。控制城门，接应我们！一定要把钱保护好！我带人掩护。”

原来，红军游击队进入交通银行后，陈连长把枪“砰”地一声往柜台上一放，厉声喝问：“谁是经理？我们是红军，来借点军饷。”

银行的人，面对 10 多支乌黑闪光的驳壳枪惊呆了。虽然谁也没有讲话，但是目光却不约而同地偷偷斜视着一个胖家伙。连长陈松为人机警，立刻判定胖子是经理，翻身跳过柜台，一把抓住此人的衣领，用枪点着他的脑袋，厉声说道：“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把保险柜打开，饶你们不死；否则决不留情。要死要活由你们自己选。”银行的经理吓得浑身哆嗦，立刻乖乖地把钥匙交了出来。其他人也面面相觑。

敌人继续向十字街口方向飞奔，红军战士的枪口也在缓缓移动。当敌人拥挤到红军游击队设置的障碍面前时，所有的驳壳枪，一齐向敌人扫去。前面的敌人清除障碍，还没有直起腰来就一个个倒了下去。后面的敌人，立刻分散开来，进行还击。敌人的密集枪弹，打得房子上的瓦片乱飞。游击队的同志，有的负伤了，包扎一下，继续坚持战斗。敌人依仗人多势众，喊叫着，一窝蜂似的向前拥。游击队的手榴弹好似冰雹，劈头盖脑在敌群中爆炸，打得敌人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战斗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忽然从西北城门方向，传来了一阵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估计可能是陈连长占领了城门，或者是埋伏在城外的部队增援来了。敌人听到背后响起了枪声，更加慌乱起来。游击队乘敌人进退不定之机，向敌人打了一排手榴弹，利用烟雾作掩护，敏捷地从敌人面前穿过，向西北方向冲去。

卢胜带着游击队员冲出了云霄城，同陈连长等在城外会合。还没等卢胜开口，陈松便拍着一大包钞票说：“一万多元，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卢胜兴高采烈地说：“咱们全团也用不了，应该分一部分给根据地的群众。”

这时，城里又传来一阵枪声，战士们风趣地说：“这次到银行取款没有带支票，敌人发脾气了！”

不久，敌人果然调一部分部队回来看守老窝，对平和一带红军主力的进攻便很快被粉碎了。

贺炳炎木锯断臂

贺炳炎是我军将领中久负盛名的独臂将军之一。他的右臂是在长征途中与敌作战时失去的。贺炳炎以铮铮铁骨的伤残之躯，率领部队顽强战斗，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1935 年 11 月 19 日，为了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在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从湘西桑植县刘家坪轿子垭和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被誉为“孤胆英雄”的贺炳炎任红 5 师师长。12 月，队伍行进到云南省瓦屋塘，在与敌作战中，贺炳炎第六次负伤，右臂被炸成肉泥，必须立即截肢抢救，否则有生命危险。当时，医疗手术器械都已驮运转移了，一时无法取来。医生找到一把木工用的锯子，要用它锯掉贺炳炎伤残的右臂。止痛药也没有了，只好以吗啡替代。贺龙见了，忧虑地说：“吃这么多吗啡，往后怎么打仗哟！”贺炳炎听后，觉得贺总说的也是，二话没说，毅然咬紧牙关，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条件下让医生以木锯截臂。听着吱吱的锯骨声，贺炳炎疼痛难忍，就把毛巾塞在嘴里咬住。待到截完肢，毛巾已被他咬成了碎片！贺龙拾起一块残骨保存起来，心痛地说：“这就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啊！”贺炳炎伤残未愈，部队继续长征，他坚持在担架上指挥行军作战。

1936 年 7 月 1 日，红二、红六军团翻过三座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 32 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炳炎改任红 6 师师长。这时，张国焘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向他一起反对党中央。贺炳炎坚决站在朱德、贺龙、任弼时一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顶住了张的要挟。他深入连队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他把全师指战员集合起来讲话，愤慨地揭露张国焘的罪恶阴谋。他指示部队说：“张国焘发给我们的那些小册子，除了军用地图留下有用外，其他统统烧掉！真中央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我们要跟着朱德、贺龙坚决北上，去会合真中央！”贺炳炎及时让全师指战员明白了真象，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7 月 7 日，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向哈达铺前进。红 6 师担任了全军后卫的重任，既要同围追红军的敌人作战，又要收容整个部队因伤病而掉队的病员。部队穿过千里茫茫的草地时，野草已被前面的部队挖光。贺炳炎亲自去遍尝百草，寻找充饥的草根。一次，有位同志实在因找不到可吃

的草根而赌气不挖了，贺炳炎诙谐而坚定地说：“为了活命，为了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找一找吧。”后来草根也找不到了，他们只好把皮带烧烤煮烂充饥。配给贺炳炎有一匹战马，他自己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运伤病员。战士们经常看到，贺炳炎让重伤员骑在马上，轻伤员拽住马尾，他自己拖着残疾之身，独臂为伤病员引缰牵马。贺炳炎就是这样领导红 6 师战胜艰难险阻，克服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走完了长征之路。

他是重生亲父母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陈毅在《赣南游击词》这段脍炙人口的词篇，深刻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英雄无敌的人民军队同坚强不屈的人民群众父子般的骨肉关系，以及鱼水般的情谊，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思绪万千。下面介绍的《他是重生亲父母》的故事，同《赣南游击词》的写作年代相同，因此，它是此词特别是上述词句的佐证和诠释。

1936 年 1 月，闽东红军的一部分，在番坑以北山区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吴立批所在的教导队担负了掩护指挥机关突围的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吴负了伤，无法随部队行动，上级决定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养伤。

这是一个月黑的夜晚，吴立批在战友护送下，到了一户农家。这家男主人姓周，50 多岁，是个木匠。他的老伴年约半百。他有两个儿子，长子被反动派拉去，在联保所当壮丁，二儿子在家里干农活。这一带，是游击区，反动派曾以“窝藏”、“包庇”红军人员的罪名，杀害了许多无辜善良的群众。因此，几位红军战士心中忐忑不安地征询周木匠的意见，要求留吴立批在他家养伤。老木匠拍着胸脯，十分爽快地说：“好！留下吧，我家里有老婆、儿子，只要有一个人在，也要保护好红军同志。”

天快亮了，敌人随时会来搜查。这时吴立批还穿着沾满血迹和泥巴的军服，头戴红五星的军帽，脚穿草鞋。老婆婆慌忙帮吴换上她儿子穿的衣服和鞋子。第二天，又把换下来的军服拆洗干净，用树叶、草叶染成青不青绿不绿的杂色，再加上一些破布，费了好几个黄昏，替吴缝成了一套便衣。

老木匠又在山里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每天天不亮，他背吴到洞中隐蔽，晚上又背回家调治养伤。山洞里铺了一层厚厚的干草，躺在上面柔软而又暖和。他行动十分小心谨慎，每次来洞时，总要把踩倒的野草扶起来，再在洞口上撒上枯叶，掩没痕迹。山上有虎狼出没，他不放心，就让老婆婆时常来探望，陪伴伤员。老婆婆一边给伤员喂饭、喂水和擦洗伤口，一边哭诉：她的大儿子怎样被强拉去当保丁；她给大儿子成亲备下的两只羊、一口猪、六只鸡，还有粮食衣物，怎么被反动派抢走，到如今害得人财两空，连糊口活命都困难。听着老人讲到伤心处，吴立批又恨又急，巴不得快点痊愈，重返队伍，替天下受苦人报仇雪恨。

可是，事与愿违，吴的伤口很顽固，化脓发炎，溃烂得很厉害。眼看带的外用药快用完了，老婆婆急得落泪，催老头快想办法。老木匠默默不语地端详了一阵，走出去了。过了大半天，他气喘吁吁地拿着在山上采回的一把草药，把它炒干，用石头磨成粉末，敷在吴的伤口上。有几天，老木匠不在家，都是老婆婆替吴上药。这药是木匠按祖传秘方配制的，治疗红伤非常灵验，不过 20 多天，吴立批的伤口已消炎退肿，长出新肉。伤口还未全好，吴想早日归队。因为，几年来敌人反复“围剿”和“清剿”，加上严重的经济

封锁，给苏区和游击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木匠家境十分贫寒，全家人本来就只能用地瓜干加野菜、树叶充饥，现在又多了一个伤员，就更加困难了。有好几次，老木匠翻山越岭出远门找活干，辛辛苦苦地挣点工钱，买几斤地瓜干，自己家人舍不得吃，全给伤员吃了。不仅这样，他们还担惊受怕，经常遭到敌人的毒打和刁难。有次敌人来搜山，强迫老婆婆带路，要她指出红军藏在哪里。老婆婆一边大声喊着："这里哪有红军，我带你去看看！"一边拐弯抹角地领着敌人在山里转圈子。敌人累得要死，一无所获，便把老婆婆打一顿。她回到家时，披头散发，伤痕累累，吴立批见状不由得哭了起来。她说："孩子，忍着吧！等红军打回来，让坏蛋们跪着，他们就不敢站着。"

老木匠很理解伤员的心情，便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有一天他大儿子回来，老头装作闲谈似地问道："好久不听说红军的消息，大概被中央军'剿'光了吧！"大儿子心不在焉地摇摇头说："哪里剿得光！"老木匠故作惊奇地说："啊！还有？他们在哪里？"大儿子说："在福安穆洋附近发现过。"老木匠牢记在心，到晚上和吴商量："你现在伤口还没有全好，不能走远路，可等你伤口全好了，红军又不知哪里去了，我先去找找看，找到的话，同他们联络好，再送你走。这次顺便可以带点米回来给你吃，好好养一养。""你没有钱怎么走呢！"吴问。他说："我可挑副担子，一面做工一面找。"

第二天黎明，老木匠挑着担子下山了。过了八、九天，他回来了。可是乍一见，把吴立批和老婆婆吓一跳，他面色憔悴，脸上和手腕上带着伤痕，走路一瘸一拐，衣服破烂不堪，这是怎么回事呢？听完他的述说，吴立批不禁肃然起敬，泪洒衣襟。

一路上他一边做木匠活，一边打听红军的消息。走了 200 多里路，好容易在社口附近找到了红军。部队首长接见了他，给他 5 块钱，叫他把伤员送到穆洋北边山上的联络站去。谁知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没有通行证，他被民团扣押起来。民团的人问："你是寿宁人，为什么跑到福安来？你不是红军是什么？"他笑着回答："你看看我胡子一把长了，手掌上的老茧这么厚，不是木匠是什么？你要不信，可以拿件家俱我当面修给你看。这年景生意不好，只好到处跑，哪里有生意就跑到哪里去。福安、寿宁都是福建地方，难道不可以来？"民团便搜他的身，搜出 5 块钱。5 块大洋在那种吃树皮、草根的年代，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足足可以买到 200 斤大米。民团团长像饿狼见到肥羊一样，眼睛都亮了，于是便蛮不讲理地说："嘿，一个臭木匠哪能赚到这么多钱，一定是红军侦探，把他捆起来，看他说不说实话？"

这样，银元全被抢走，还把他关在碉堡里吊打，整整被折磨了三天三夜。老木匠心想："我活了 50 多岁也该死了，可是我一死红军委托我的事办不成了！"不得已，他故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那个民团团长说："老总，我还是去年 9 月间出门的，自己省吃俭用才剩下这 5 块钱，家里几张嘴正等着我回去呢？请老总开恩吧，放了我，就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民团团长听他说的合乎情理，除了这几块大洋，也没有别的油水可榨，只好把他放了，并且还退给他一块银元。

老木匠讲到这里，手托银元，高兴得像个孩子，一点也看不出刚经过一场折磨的样子。他笑着说："还算走运，从老虎嘴里吐出一块钱来，可以给你买米吃了。"吴立批听说找到了部队，心中非常高兴，可又一想，这 100 多里路，要经过不少关口，怎么走呢？吴把心事告诉了老木匠，他立刻回答

说：“我早想好了，咱们假扮师徒，拿个证明书，一边做工，一边走，敌人把守再严也能混过去。”

为了搞到通行证，老木匠把主意打在了他大儿子身上。他到联保处对大儿子说：“我出去了一次，赚回一块大洋，那边生意好做，中央军都退走了。听说红军快要到这里来了。”他还编了很多敌人吃败仗、红军打胜仗的消息，说得活龙活现，像耳闻目睹一样。他是想吓唬一下大儿子，让他给自己留条后路。吴立批在家养伤一个多月的事，老木匠一直瞒着他的大儿子，这次见他儿子面有惧色，便直截了当地说：“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红军伤兵，年纪很轻，我想把他送回去，你看行吗？”大儿子胆小怕事，忙说：“不要管他！”老木匠白了儿子一眼说：“为什么不管，你再不做点好事，等红军回来，哼，看你怎么办！”大儿子着急了，就求助于父亲。老木匠说：“我想让他装扮成我的徒弟，去找红军，只是没有通行证，你给弄一张！”大儿子无可奈何，只好答应。

过了两天，师徒俩带着通行证，挑着担子下山了。老婆婆含着眼泪，把吴送到山下，拉着吴的手叮嘱说：“路上小心，今后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我们，孩子！”吴流着眼泪，依依不舍地说：“阿婆，我一定要来看望你老人家。”

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他们很顺利地在社口西北山上找到了部队。吴立批向首长详细汇报了他在老乡家养伤的情况，首长亲切地拍着老木匠的肩膀，表扬了他的高尚品德和英雄行为，向他道谢。老木匠十分激动，又是欢笑又是流泪。吃过午饭，老木匠要回去，吴送他出岗哨。他边走边说：“孩子，你要好好当红军。要坚决革命到底，有机会再到我家来，我也兴许来看你。”吴立批说：“阿爸，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地干革命！”走出岗哨，老木匠站住了，望了吴很久说：“阿婆会想念你的，你一定要回来啊！”吴立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喉头像塞着什么东西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人渐渐远去，吴立批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他也不时回转身挥手告别。

智取东阳岗

1936 年初，坚持在皖西革命根据地的红 28 军，为和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斗争，采取了“化整为零”和“集零为整”的战术，分多路转移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时任红 28 军红 224 团副团长的林维先决定智取敌寨东阳岗。他利用在战斗中缴获的敌贵州军队第 102 师大量军服和敌团长的信件、名片，将所率的两个营的红军战士全部伪装打扮起来，由一名连长化装成尖刀班长，自己化装成敌团长。一天下午，林维先率部来到东阳岗敌寨。到了寨门口，守寨哨兵把枪一横，拦住了尖刀班。见此，戴着一副黑眼镜，手提文明棍的林维先，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来，敌哨兵见是个大官，赶紧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林维先连正眼瞧都不瞧他一下，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对尖刀班长说：“你们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让部队进去休息。”哨兵早吓得不敢吱声了，就这样林维先他们大大方方地进了寨子。躲在旁边炮楼里的敌军连长听下面有动静，伸出脑袋一看，一支正规的“国军”已来到寨子里，忙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不等他多问，林维先就板起面孔朝他凶了起来：“谁是这里的连长，怎么不赶快出来！”敌连长见状已胆怯三分，又听哨兵说对方是个团长，得罪不起，慌忙跑下来把林维先请进了他的房间，又是打座，又是倒茶，恭敬

地立在一旁。这时，林维先坐定后不紧不慢地问道：“你们在这里驻防，这一带的‘匪’情怎么样？还有哪些部队在这一带啊？”敌连长“唰”地来了个立正：“报告老总，这里还没有发现匪迹，所以只有我们保安团的一个连驻在这里。”林维先一听，心里踏实多了。又板起了面孔训道：“你们太麻痹了！眼下有一支共匪的小分队到这里来，他们的战术很狡猾，你们千万大意不得，要好好地防守呀……”敌连长接连不断地点头称是。林维先接着又说：“据我们得到的准确情报，他们要来袭击东阳岗，我们赶到这里来，就是来‘堵剿’的，你赶快传达我的命令，立即封锁消息，不准向任何人透露我们部队开到这里了。”见敌连长毫无怀疑的样子，林维先趁热打铁，又装做煞有介事的样子给他设了一个圈套：“为了有效地防范共匪的袭击，你们把东边一带让出来，由我的弟兄们接防，西边由你们防守。你们同‘国军’协同作战，关系重大，不能有丝毫的疏忽！明白么？”这一切敌连长都信以为真，乖乖地听着安排并谦恭地说：“我们保安团没上过阵，士兵都怕共匪，最好请长官给训训话，鼓鼓气。”“可以，可以。”林维先满口应允了。

当天晚上，林维先将敌连长留在住处，亲自带人来到寨子的大操场上，利用训话的机会，一枪未放，就将一连的敌兵全部缴了械。智取东阳岗，顺利闯过敌人的关卡。

两颗门牙

1936 年 2 月，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又奉命进行东征。在率部抢渡黄河时，徐海东冒着倾盆大雨，骑着战马，紧贴着正在急行军的部队朝渡口方向飞奔。突然，前面不远处，从纵队行军的行列中闪出一个战士，转眼之间徐海东的战马已和这个战士贴近，就在战马即将撞上那个战士的危急关头，躲闪已经来不及了，一场危险眼看就要发生。只见徐海东立马直身，拼命勒住了缰绳，把马拉住。结果，战士得救安然无恙，徐海东却被腾空而起的战马重重地甩在了路旁的一颗大树上，当即昏了过去，当同志们把他扶起时，满嘴吐血，两颗门牙被摔掉了。

几天以后，徐海东经过医院抢救恢复了知觉，可由于摔得太重，不仅门牙脱落，而且满口牙床也有些松动，连饭都没法吃。一次，心疼他的妻子在说话中流露了对那位战士的埋怨，徐海东马上纠正说：“你这个人，就爱罗嗦，只怪我的心太急嘛，哪能怨人家。你可知道，要是踩伤那个战士，我可是该受处分的哩！”听徐海东这么讲，站在旁边一直没有吭声的马夫生气地插了一句，“说什么也要给那个战士一个处分！”“胡说！谁给的权力？没把人家踩死，还要处分！”没等马夫说完，徐海东装着很生气的样子便吼了起来。以后他的妻子和马夫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毛泽东在总结东征战役的讲话中，曾风趣地向与会者讲：“我们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只是海东同志丢掉了两颗门牙。”

一位亲切可敬的朋友

1936 年 2 月，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省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实行战略展开，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抗日团体，建立革命政权，扩大人民武装。其中，组织贵州抗日救国军，便是一件卓有成效的工作。

2 月 8 日，任弼时主持在大定的孔庙召开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并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等出示布告；一切抗日反蒋的武装队伍，不愿受蒋压迫而携械散在山林的白军官佐士兵及民间绿林，“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联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进占毕节后，王震、夏曦等便着手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请贵州省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出任司令，邓止戈任参谋长，下辖三个支队。

周素园当年已 57 岁，辛亥革命时在贵阳主编《黔报》，后任贵州省行政总理，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德高望重，很有影响。他因不满国民党政治腐败，军阀混战，1925 年后回毕节赋闲。从此杜门谢客，专心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认真阅读。“九一八”事变后，他深感民族危亡，报国无门，甚为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红军进逼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要他离家出走，他断然拒绝。当红军礼请他组建抗日救国军时，他欣然接受，并立即在毕节城内十字街周宅门前挂出牌子。一时，散落山林的反蒋抗日队伍纷纷投奔而来。任弼时到毕节后，特地设宴款待了周素园。2 月 24 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小教场正式宣告成立。红军在毕节期间，任弼时、贺龙让周素园给国民党滇军第 3 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嫡系部进入了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天虢，史有明鉴。”孙渡受到启发，一度按兵不动，使红军得以休整。

在各路敌人纷至沓来，红军被压缩于毕节狭小地区的情况下，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退出毕节，拟到安顺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2 月 26 日晚，毕节的小教场聚集着上万军民，灯笼火把将偏僻的山城照耀得如同白昼，这既是红军和山城人民的告别大会，又是向乌蒙山转移的誓师大会。会后，群众举着熊熊燃烧的火炬举行盛大游行。由于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扩红 5000 多人，红二、红六军团已发展到 2 万多人，抗日救国军的第二支队编入红六军团第 18 师第 52 团；红二军团组建了一个新的团队即第 5 师第 14 团。

27 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向赫章进发，王震、肖克率红六军团向南绕道前进，准备在七星关、平山堡地区与红二军团会合。周素园坐上滑杆，挥手告别家人，同红军一道踏上万里征途。后来，部队进入云南，昼夜行军作战，生活十分艰苦，任弼时和贺龙鉴于周素园年长体弱，拟拨一笔款，送他去香港，一面治病，一面作统战工作。邓止戈将此意图转告周素园时，老人说：“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近 60 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后来，周素园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备尝，终于如愿以偿，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对于周素园的爱国之情和雄心壮志十分赞赏，称他为“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周素园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周素园一生勤奋，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贺龙长征过乌蒙

1936 年新春时节，真是天从人愿。当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农历正月初十犹如天兵降临，浩浩荡荡，渡过波涛滚滚的乌江上游鸭池河后，地处乌蒙山脉千里冰雪的黔西北大地，骤然气温回升，冰消雪化，春意融融，一派生机盎然景象。

红军在这片古老边远、高寒贫瘠的土地上，新开辟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这里破天荒地出现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稀奇事：近百个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于黔西北广大城乡；苦大仇深的挑水夫朱绍清当了毕节县县长（县苏维埃主席）；花甲老人周素园先生挺身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参加红军，又离乡别亲，坚决地与红军一道走上长征路；穷苦人争先恐后加入红军，有 5000 多名当地青年参军，跟着贺龙踏上万里征途。

整整 60 年过去了，贺龙在黔西北创建根据地的丰功伟绩和许多神奇佳话，一代接一代地往下传。其中最为精彩的有以下几桩：

1935 年，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 22 个师 5 个旅 130 个团共 20 余万大军,集中对掩护、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贺龙、肖克所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进行疯狂“ 围剿 ”。在 10 倍于己的强敌面前，为保存革命实力，红军不得不放弃湘鄂川滇革命根据地，挥师西进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贵州，新建苏维埃政权。

1936 年 1 月 12 日，红二、红六军团攻占贵州石阡。19 日，贺龙、任弼时在县城召开由两个军团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作出进军黔大毕的决定。转移途中，贺龙接到中革军委向红二、红六军团发出的“ 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 ”的电报。这更加坚定了贺龙等人在黔大毕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命令下达后，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突破敌军重重封锁线，用 9 天时间，接连攻下猴场、瓮安、平越、龙里及离省城贵阳只有 30 多公里的洗马河。在兵临城下之际，刚刚飞到贵阳督战的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如热锅上的蚂蚁，慌了手脚，急忙宣布全城戒严，一面强迫贵阳的居民出城修筑碉堡，一面星夜派人向桂系军阀求救，同时十万火急地将原在鸭池河布防的第 99、第 23 师调回贵阳保驾。

1 月 30 日，贺龙决定趁敌混乱之机，抓紧时间强渡鸭池河。在进至贵阳郊区新铺时，从电台中得知敌郝梦龄纵队的 3 个师已奉命由遵义南下，准备拦截红军。贺龙说：“ 不能让郝梦岭南下，必须把他滞留在江北。 ”李达参谋长按照贺龙的意图，即命令各部队：折向黔北，攻扎佐，占修文，打息烽，进遵义。这一突然变化，顾祝同真以为贺龙要走去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渡赤水河所走过的路线，立即通知郝梦龄停止南下，死守遵义。当郝梦龄勒令所部拚命挖筑工事时，贺龙突然令传红军各部队：“ 后卫变前卫，目标镇西卫（现清镇县卫城镇）！ ”红军行进中的队伍刹时间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兵锋直指乌江上游鸭池河渡口而去，把国民党军拖得晕头转向。

贺龙把郝梦龄一甩，便跨上骏马，率领红二、红六军团风驰电掣般夜以继日向鸭池河渡口奔去。

鸭池河位于清镇、黔西两县之间，是贵阳通往黔西北的要津。河宽 100 余米，深达 10 余米，水流湍急，暗礁险滩遍布。两岸山高林密，悬岩峭壁，十分险峻。来往行人、物资，全靠木船摆渡。此时，守卫在鸭池河一带的国

民党军，几经贺龙的“调遣”，正规军已基本走光，只剩下少数的地方保安团把守。

为确保渡河万无一失，贺龙令红 6 师为先导，并从各师抽调 120 多名侦察员组成先遣队，由队长王绍南率领，每人 1 支手枪、1 只手电筒，换上便衣，在毛毛细雨中，一天以 90 多公里的急行军，从镇西卫赶到离鸭池河渡口 5 公里的茶店。时天还未亮，驻在关帝庙内负责守卫渡口的 60 余名敌兵还在睡大觉。红四师侦察参谋胡克忠带尖刀班摸掉敌哨兵，尔后，王绍南率先遣队冲进庙内，对睡梦中的敌人大吼道：“不准动！”“举手投降！”“缴枪不杀！”这时，敌连长“唰”的一下站起来，连声大叫：“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红军！”随着王队长这一如雷贯耳的回答，所有的敌人都举起双手，当了俘虏。接着，红军飞兵直奔鸭池河渡口，赶到河岸时，天已大亮。同时，贺龙派到鸭池河下游强过索桥的红 18 团部分指战员，也插到守敌背后，截断他们与黔西敌军的联系，同先遣队及红 6 师形成河东、河西两面夹攻之势。敌人见状，如惊弓之鸟，大声惊叫：“共军来了！”胡乱打枪，四处逃窜。此时，红六师紧随先遣队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一面抓紧强渡，一面用缴获的电话线、铁丝，拧成缆索，拴在河东岸的巨石和西岸的大树上，再用 4 只船在水中固定住缆索。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军搬来门板、木料架成浮桥。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策马率领红二、红六军团 1 万多人过河，仅 3 天时间，顺利渡过乌江天险鸭池河，打开通向黔西北的大门。

当原守鸭池河的国民党军第 23、第 99 师从贵阳赶回来时，红军已将所有船只封锁，拆掉浮桥。贺龙留下来守卫黔西北大门的红 18 师指战员，严阵以待在河对岸。国民党军面对波涛滚滚的鸭池河，只有垂头丧气，望江兴叹。

红六军团的宣传队员陈靖即兴为战士们编唱了这样一首妙趣横生的歌曲：

“远看像条索，近看鸭池河。
你在那边拼命堵，红军硬要过。
要过，要过，这就过，你来送行满不错。
你在那边站岗哨，我在这边来洗脚。”

1936 年 2 月 3 日拂晓，红军先遣队发出的信号弹划破宁静的黔西县城上空，把全城照得如同白昼。就在这一刹那间，红六师从东西南北各城门一齐攻入城内，胜利占领黔西县城。然后，其它各师也先后开到黔西集结。

为贯彻中革军委 1 月 23 日、28 日先后两次向红二、红六军团发出的关于在黔大毕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电报指示，贺龙、任弼时于 2 月 5 日在总指挥部驻地黔西城新川祖庙，召开了有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李达等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黔西会议”）。会议除讨论和布置在军事上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迅速解放大定（今大方）、毕节等黔西北为中心的广大川滇黔边区外，还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撤销原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正式成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川滇黔省委，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和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全面工作；二、成立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以黔大毕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各项工作的开展。

2 月 8 日，任弼时在大定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向群众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宣布贺龙任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命令时，会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任弼时告诉大家：“今

天，贺龙主席正在前方同敌军万耀煌部作战，不能前来同大家见面，他请我代向各位乡亲父老们问好，……”台下的老百姓当时虽未见到贺龙，但一听说是由这位传奇英雄担任省主席，倍感亲切。会后，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城乡到处贴着印有贺龙主席署名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 4 号），其中写道：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川滇黔省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它的紧急任务是发动团结全民族，打倒中国民众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和封建地主阶级，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和抗日反蒋的根据地；号召广大工农民众自动加入红军；解除民众痛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民众生活，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士兵、失业者和难民；惩办一切反动分子，镇压豪绅地主。老百姓看到布告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有贺龙给我们撑腰，还怕哪样？走，干革命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抗日反蒋，扩红，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财物，镇压反革命为中心的运动，以燎原之势在黔西北大地上熊熊燃烧。

这年，黔西北各族人民在中共川滇黔省委和贺龙主席的领导下，全区有毕节、大定两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黔西、大定、毕节 3 县建立了抗日大同盟；滥泥沟、瓢儿井、响水、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铺等 8 个区建立了苏维埃临时政权，95 个乡、镇、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共有 103 个区、乡、镇、村组建了人民武装组织——游击团（队）；全区共有 5000 多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红二军团第 5 师第 14 团和红六军团第 18 师第 52 团就是在毕节地区新组建起来的。很多地方整村整寨的青年参加红军，还出现了父子、兄弟争着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黔西县沙窝游击大队近百人除老弱幼小队员外，全队走到城里集体加入红军；大方县瓢儿井游击队队长杨子君带领全队 82 名队员一起参加红军。当时黔西北到处都传唱着这样的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长官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2 月 18 日，贺龙在大定城总指挥部得知敌郝梦龄纵队有向煤硐场进六龙的动向后，急令红 6 师立即从大定出发，到黄家坝一带阻击敌人。根据群众送来的情报和侦察队的侦察，郝部第 54 师、新 8 师已到达黄家坝老街一线。贺龙立即策马驰赴战场，把指挥部设在离郝敌仅隔一个小山头的梁子街上。即令红 6 师分为 3 路从草左梁子、红岩丫口、箐脚 3 个方向，趁黄昏时刻，出其不意地向黄家坝之敌发起猛攻。

红 6 师一出击，就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迅速占领跑马坝，突破了敌第 1 道防线。在继续向第 2 道防线发起攻击时，敌人拼命顽抗，老街的援敌也堵上来，进攻受阻。这时天已黑尽，正在指挥部的贺龙把几个指挥员叫在一起，面授诱敌机宜。之后，跑马坝、神道碑一带战场林间树杈上，突然间挂满闪着红光的灯笼和打开开关的手电筒，红军大队人马却在急促的枪声中，悄然撤离战场，分两路绕道向敌人的两侧包抄。被迷惑的敌人，集中火力，向树林中的红灯进行猛烈射击。就在这时，绕至敌背后的红军突然杀入敌阵。敌人哪来得及还手，就被红军全部歼灭，敌团长被击毙。此后，红军又按贺龙的部署，有计划地悄悄撤离战场。从各个方向增援上来的敌人在夜暗中不

明对方情况，互相射击，一直打到天亮，他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又上了贺龙的当！

这次战斗，红军大获全胜，敌郝梦龄部损失了 1 个团的兵力，红军缴获长、短枪和轻机枪 60 余支（挺）。

孟春三月，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峡谷中，经常有漫天浓雾出现。

这个月，国民党军察觉到红军要从赫章以则河一带进入云南奎香，认为红军一定会从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代理蒋介石督战的顾祝同急令樊嵩甫、郝梦龄、万耀煌 3 个纵队急转西北方向追击，又令川军进行阻截，企图围红军于高寒贫瘠、人烟稀少、给养极难的乌蒙山峡谷死地。

面对强敌，红二、红六军团在 3 月 8 日决定红 4、红 17 师由贺龙率领，从奎香返回以则河一带伏击尾追的敌樊嵩甫纵队，坚决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

贺龙回师以则河后，在苗营、白雨洞、倮依、荒朗沟、舍虎梁子、聂家丫口、偏坡寨等 10 多处有利地形设伏，兵分三路阻击来敌。

是日拂晓，战斗先在聂家丫口打响。敌军发现红军已全部控制有利地形，便仓皇向山下撤退。红军乘胜追击，敌军遭到大量杀伤。此时，站在苗营指挥所的贺龙，看见可乐方向的群山正在被低空飘浮的乌云浓雾笼罩，自言自语地笑道：“樊嵩甫，这回有你的好戏看了，准备向你的主子邀功请赏去吧！”说罢，急令各路红军将樊敌先头部队向可乐方向浓雾弥漫的群山峡谷中追赶。

这天，浓雾之密，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拚命逃入雾区的敌人，正与樊嵩甫亲率的援军在迷雾中相遇。他们一听对面枪响，也就不顾一切地打起来，直杀的尸横遍地，还不罢手。

这时，贺龙率部在当地群众的带路下绕过雾区，又在白雨洞、飞来石一带设阻，痛击外逃之敌。

以则河之战，从拂晓打到下午 6 时，以贺龙所率红军的胜利和樊敌的惨败而告终。此次战斗，红军共击毙、杀伤和俘敌 6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战斗一结束，贺龙为防备敌人在雾散后乘机反扑，给红军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立即收兵，率部撤离阵地，潜入巍峨的乌蒙群山中。等大雾散去，敌人增援部队赶到时，红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则可战斗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崇山峻岭中再次寻机歼敌，恰好从刚捉到的两名俘虏口中得知，敌纵队司令万耀煌将亲率第 13 师，在 3 月 11 日前后从赫章路经哲庄坝到镇雄一带指挥“围剿”红军。于是，贺龙当即决定派红 4、红 5、红 6 师兵分 3 路抢先赶到哲庄坝伏击敌人。第 1 路由巴基梁子至三锅庄设伏；第 2 路负责封锁从巴基梁子、哲庄坝到黄家营盘一线；第 3 路担负阻击从大屋基梁子和桃园丫口的来敌。安排就绪后，贺龙坐镇桃园丫口指挥。

3 月 12 日清晨，万耀煌果然从赫章方向而来。他骑着高头大马，佩带“中正剑”，耀武扬威，率部向哲庄坝行进。待敌军全部进入红军伏击圈后，贺龙一声令下，将敌截断分割包围，把 1 个旅围于桃园：另 1 个旅围于哲庄坝；阻万耀煌在黄家营盘一带，使之不能首尾相顾。红军指战员从四面八方一齐开火，在震撼山岳的冲锋号声中，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

“活捉万耀煌！”红军指挥部中传出贺龙洪钟般的声音，红军指战员也

高喊着这一口号冲下来。

万耀煌被吓得魂飞魄散。他连忙从士兵身上抢来一套破烂军装，将身上的将军服一脱，大檐帽一甩，化装成马夫，混在四处逃跑的士兵中，拚命外窜，后在赶来救援的第 99 师保驾下，方才逃脱。由此，“ 贺龙一声喊，敌司令变马夫 ”的故事，在黔北大地迅速传开。

哲庄坝战斗，整整打了一天，红军大获全胜。敌第 13 师被打得溃不成军，被毙伤 900 余人，俘 4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30 余挺，步枪 400 多支和大批军用物资。红军也有少量伤亡。红 6 师第 18 团政委余秋里在这次战斗中手臂负伤，后实施截肢手术；连指导员田华堂因保护余政委而光荣牺牲。这次战斗的胜利，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进一步夺取突围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粉碎强敌的围追，实现战略转移，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毕节城后，进入乌蒙高原。红军既要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又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贺龙惦记着同行的、年迈的爱国志士周素园老先生，担心艰苦的行军会把周老的身体拖垮。因此，贺龙一面指挥部队作战，一面千方百计设法妥善照顾周老。

有一天，红军急行军来到云贵两省交界的镇雄时，部队已十分疲惫。贺龙把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周素园的挚友邓止戈找来，请他代做周老的说服工作。贺龙说：当前红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再拖下去怕他老人家的身体吃不消，我们想方设法送他到香港作寓公，帮助共产党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如他愿意，我们可将打土豪缴获的黄金给他一些做生活费用。

当邓止戈把贺龙的这些话向周素园老人转达后，周老却坚定地说：“ 请邓参谋长立即回答贺军长和王震政委，我今年 60 多岁了，60 岁以前我没有找到光明，现在终于找到了光明，参加了红军。这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离开红军。 ”

当贺龙听完邓止戈的汇报后，情不自禁地把大腿重重一拍，举起大拇指赞叹道：“ 好！好！我们把他抬着走，这样坚强的老人，难找啊！

贺龙的这段话，周素园闻知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他们并肩行进在长征路上，肝胆相照。周素园随着红军大部队，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 10 月胜利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善打“ 政治仗 ”的将军

李志民将军自 192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后，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不仅把部队本身的政治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卓有成效，起到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而且还在敌我对阵的战场上，积极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配合军事打击，打了不少漂亮的“ 政治仗 ”。

1936 年 5 月，时任红 81 师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随部参加了西征战役。9 月上旬又奉命南下，围攻李旺堡。李志民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李旺堡城墙坚固，城外河滩开阔，敌军有 1 个骑兵团的兵力防守，易守难攻。但敌守孤城，厌倦内战、士气低落，且内部矛盾重重。基于这一分析，他建议采用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打法，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他的建议被采纳，于是他发动全师指战员，大家献计献策，利用风筝，“ 孔明灯 ”等方式飘送宣传品。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宣传队，白天在城

外村庄宣传发动群众，夜晚抵近城墙对守敌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

经过几天的对敌宣传，守城敌军对红军的态度越来越好。李志民认为时机已到，遂写了一封致守城敌骑兵团团长及全团官兵的公开信，晓以抗日救亡大义，邀请他们派人出城谈判。第二天，守城敌军就派了代表前来谈判，答应撤出该城。就这样，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取得了李旺堡，创造了政治攻势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

同年 12 月，东北军王以哲部 129 师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红 81 师担负着在河连湾以西地区进行阻击的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李志民深入发动指战员做好政治攻势上的准备。在东北军必经的路上，凡是能写字的地方，都写上标语贴上《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造成一种动员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气氛。有一次在阵前，李志民及时组织前沿阵地指战员向东北军喊话：东北军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在红军激动人心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下，东北军 129 师即停止了进攻，很快就退了下去。之后，李志民又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前沿进行宣传，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以歌声唤醒东北军官兵的怀乡情思，激发抗日热情。进而他们还邀请东北军官兵到红军阵地上来联欢、座谈，共抒联合抗日的情怀。

就这样，红 81 师打了一场奇特的漂亮的“阻击战”，白天“打仗”，夜晚联欢，化敌为友，双方无一伤亡。

直到发生“西安事变”，东北军官兵在阵地上留下了“红军兄弟，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撤离了战场，结束了这场“政治仗”。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正式成立于 1936 年 6 月，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主要训练经过长征的工农出身的红军指挥员，提高他们的军事水平和指挥艺术，学习革命理论，总结自身的带兵、用兵经验。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在各方面军、革命根据地红军学校、红军大学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合并、升格组成的。

最早成立的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学校。1927 年 11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以后，为培养骨干和干部，就创办了教导队，赤卫队队长陈伯钧任党的书记。后升格为教导大队，陈毅兼任大队长，后由梁军任大队长，蔡会文任党代表。主要训练基层干部和骨干。以后由彭德怀任校长的井冈山红军学校，由石迟峰任校长、邓子恢任党代表的红军随营学校、由谭希林任校长的闽西红军学校相继建立。1930 年 4 月，闽西红军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各军、军团建立起随营学校。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培养更多的干部，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以上学校合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由肖劲光、刘伯承、叶剑英、何长工任校长。1933 年 10 月，又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别编为中央红军大学和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以及通信、特科、卫生、供给等 4 个专科学校。1934 年 10 月长征开始以后，中革军委决定将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为中央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1935 年 6 月，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教育长、刘少奇任政

治部主任，设立高级指挥、上级指挥、上级政治 3 个科，编有 1 个步兵团。

红二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始建于 1929 年春，湘鄂西红 4 军在建阳办起学生队，以后改称教导队、教导大队。1930 年 6 月红 6 军教导队在湖北监利成立。随着形势的发展，红 4 军和红 6 军教导大队合并，组建湘鄂西红军洪湖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由孙德清、赵奇、唐赤英、刘鸣先任校长，胡光霞任政治委员，后更名为湘鄂西赤色军事干部学校。1931 年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1932 年春红 7 军教导大队到达湘赣地区，改称为湘赣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后并入红二、六军团教导营。1936 年 9 月，红二、六军团教导营合并，编成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陈伯钧任副校长，陈外欧任教育长，李干校任政治部主任，设有上级指挥科、第 1 营、第 2 营、第 3 营。后这所大学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第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成立于 1930 年 9 月。鄂豫皖红 1 军在河南正阳成立随营学校。1931 年 2 月，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5 月改称红四方面军彭杨学校，1932 年停办。1933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发展壮大，又恢复彭杨学校，倪志亮任校长，傅钟任政治委员。1934 年 12 月，这所学校扩编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李特任副校长，设有高级、初级、特科、政治等 4 个班和教导队。1935 年 6 月，这所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团合并。9 月张国焘分裂红军，擅自率部南下，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分开。后红四方面军在卓木碉再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1936 年 6 月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 年 2 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改称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6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设有三个科，第一科科长陈克，政委罗荣桓，第二科科长周士第，第三科科长兼步兵学校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1936 年 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2 月，由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和刘亚楼先后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分设第一分校，林彪兼校长，罗瑞卿兼政委，傅钟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分校，刘伯承兼校长，袁国平为政委，周昆和郭化若先后任教育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

红军大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少而精的方针。培养了大批高级指挥和中下层干部。以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

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曾资助毛岸英、毛岸青等兄弟二人。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直到今天也未必知道他所资助的竟是毛泽东的儿子。

1930 年杨开慧同志惨遭杀害，遗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三人。党组织安排他们离开湖南，由其舅妈李崇德带领，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入托于共产党领导下开办的大同幼稚园。幼稚园负责人是董健吾先生。董的公开身份是王牧师，实际是为地下党组织搞情报工作。

岸英、岸青、岸龙兄弟三人入托时，岸龙才 4 岁，由于他年幼体弱，不久得了痢疾，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经抢救无效，病死在医院里。

1932 年的一天，大同幼稚园保育负责人桂荷英早晨出门，便没有回来。这对当时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说是危险的信号。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立即解散幼稚园。岸英、岸青被安排到董健吾家。开始党组织在经济上还能给董健吾一些补贴，后来由于经费困难，补贴也减少了。岸英、岸青又患病，董健吾全家生活越来越困难，地下党组织便考虑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国读书，但经费和机会一时找不到。

1936 年初，董健吾奉地下党和宋庆龄之命去解放区送信。到西安后，因大雪封路，无法通行。董健吾便通过老同学——禁烟督办钟可托引见，会见了张学良将军，说明来意，请张学良将军帮助。张学良便派他的私人飞机，把董送到苏区。从此董健吾就成了张学良的好友。同年 2、3 月间，董又一次去西安，在董健吾返沪时，张学良特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将军再三表示，如果董有什么事情他一定帮助。董为了圆场便说：如果有机会请张将军帮助把我家抚养的革命子弟（为了保密起见，没有说明是毛泽东的孩子）和自己的次子董寿琪送到国外读书。

同年 5、6 月间张学良将军来上海，把董健吾找到寓所，表示愿意资助 10 万法郎帮助革命子弟出国读书。董健吾回家后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要求党的负责人刘子华会见张学良。见面后张学良便交给刘子华 10 万法郎支票一张。

经费有了，怎样才能出境呢？正在这时，东北抗日将领李杜将军假以商人的名义申请去法国。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这三个孩子也以李杜将军家属之名，前往法国。 1936 年 6 月李杜将军一行 9 人，离沪到法国巴黎。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准毛岸英、毛岸青二人入境，其他人只好回国了。

下一步行动方向要明确

1936 年 7 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部翻过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相见。当时，张国焘正在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他想欺骗、拉拢红二、六军团，以与党中央相抗衡。但是，同他的愿望相反，贺龙虽然长期远离中央驻地，单独在一个地区开展斗争，却有着极强的党性和觉悟。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党中央如同人的脑壳，各根据地好比人的四肢，党员应当像保护自己的头颅一样地保护党中央。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遵义会议以后，贺龙深感党中央领导正确，更听不得对中央的任何攻击诬蔑。所以，张国焘煞费苦心进行的种种分裂活动，在这位党的忠诚战士面前一一破产了。

在会合后的第一天晚上，张国焘即派人给贺龙送来了一封短信，“ 约请贺总指挥前来议事！ ”看后，贺龙忙问：“ 为什么只约请我一人，没有约请任政委呢？ ”来人回答：“ 总政委说，因今日身体欠佳，先约总指挥去，明日再与任政委叙谈。 ”贺龙立即意识到，这是张国焘在施离间之计拉拢人。于是，他软中带硬地对来人说：“ 请回告总政委，本来我和任政委一到这里便要去看望他的。后来听说他染病在身，便不好惊动，现在果然证实如此，为了总政委身体早日康复，改日我跟任政委一起去拜望。望他谅解！ ”结果贺龙还是没有单独去，使张国焘自讨了一次尴尬。

7 月 5 日，党中央发布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和红 32 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两个方面军首长参加的商量有关召开会师大会、共同北上的动员等事

宜的会议上，贺龙看完张国焘送来的文件，严肃地问：“总政委，即将开的这个大会，叫做‘热烈欢迎二方面军大会’，不贴切吧？这样就分你我了。我们也不是来作客的，是共同的目标才使我们会师在这里的。”张国焘马上品味出贺龙的提问有些不对味，但仍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附和着：“言之有理，应该是欢迎及会师大会。贺总指挥是这个意思吧？”“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要把两军会师的目的搞清楚。也就是说，下一步行动的方向要说明确。”贺龙坚定地说。

这下张国焘有点恼羞成怒了：“方向？方向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丢掉这里的根据地，再向草地逃跑，我们要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西康、青海发展，逃跑主义是不行的！”激动了的贺龙慷慨激昂地指出：“现在日寇大举侵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我们红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北上，奔赴抗日前线，这是前进，不是逃跑。相反，丢掉国家民族的利益，违背党中央的指示，到荒凉偏僻的山里躲起来，这才叫逃跑，这种理论才是逃跑主义！”被贺龙的精神所感染，接着与会的许多领导同志争着发言，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评。

最后，会议通过了贺龙的提议，把会师大会的名称定为“二、四方面军会合暨北上抗日动员大会。”

任弼时同张国焘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 年 7 月 1 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附近的甘海子，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会见了朱德和张国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并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5 日，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所属第二、第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原红四方面军第 32 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

红二方面军进入甘孜地区后，一方面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和慰问，另一方面，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王震等围绕着分裂与反分裂、控制与反控制，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及军阀主义展开了尖锐斗争。一是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张国焘派人送给红二方面军的一批包括《干部必读》等文件和材料，内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内容。王震发现后，立即指令把文件烧掉，并向任弼时报告。任弼时、贺龙等在同红四方面军第 88 师等人谈话中,同样听到他们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的言论。任弼时立刻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除保留一份外，不准下发，全部烧掉。

二是坚决抵制张国焘分化和并吞红二、红六军团。王震回忆说：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革命的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肖克及六军团收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刘元帅说：送给你，你就收下。后来和贺老总一说，贺说：“这是我们以前干的！”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张国

焘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要调换红二、红六军团首长，要任弼时离开，红二、红六军团另派政委，被任顶了回去。很快，中革军委便下达了组建红二方面军的命令。张国焘分化红二、红六军团的阴谋没能得逞。

三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方面军的图谋。据贺龙回忆，张国焘派人对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要召开党的会议，任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党的会议没有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弼时、向应和我讨论如何对付。任弼时又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也没开成。”任弼时后来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议，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在甘孜的日子里，任弼时等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注意对张的争取和团结，很注意斗争的方式。两军一会合，任弼时就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从此和陕北的党中央沟通了联系。当张国焘指责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虑太多”时，任弼时针锋相对地回击说，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在张国焘为成立第二“中央”作狡辩时，任又指出张“似乎太过分了！”任弼时的一身正气和机敏，使张国焘感到一筹莫展。

在红二、红四方面军召开的会师大会上，任弼时旗帜鲜明地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两军会合后，由于任弼时等人的努力，促进了张国焘率部北上。会合之前，张国焘虽已同意北上，但他的意图不是同党中央会合，而是向夏河、洮州西北行动，企图到青海、甘肃、新疆等僻地独树一帜。因此党中央 6 月 19 日致电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因为甘南敌人兵力较弱，特别是两广事变后，胡宗南部南下向广西用兵，甘南一带仅剩王均、毛炳文、鲁大昌部，对红军出甘南有利。如果到夏洮地区，马步芳各部将于甘南敌人集结于一个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非常困难。两军会师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一致同意按中央所示方向北上，张国焘处境孤立，终于同意北出甘南。随后，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地区出发，向甘南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后开进。

党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给予极大关怀，在部队通过草地时，即不断通报敌情，给予许多指示。7 月 13 日，党中央电示红二、红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炳文）、打王（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万一攻不克则围城打援。”22 日，更进一步指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 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

上行动。党中央的指示和关怀，有力地鼓舞了两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对他们沿着正确道路北上，起了巨大作用。

红二、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的行军与作战，于 9 月 7 日，先后控制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 8 座县城和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县广大地区，形成了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有利态势。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把开展统战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通蒋抗日的方针，确定以蒋介石为主要统战谈判对手，继续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谈判，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经与东北军领导人协商，于 8 月 12 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红四方面军在 9 月底以前尽可能夺取岷县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攻击陇西和临夏，调动毛炳文、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部行动，10 月和 11 月，红军 3 个方面军在西兰公路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12 月，以 1 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军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抗击日军伪蒙军的进攻，把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接着，又决定先组织以打击蒋介石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的静会战役，提前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并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任务作了明确指示。

据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固原以北地区积极行动，打击敌人，并占领了静宁西北的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在进占徽县、两当后，随即以红六军团向宝鸡方向前进。

在此关键时刻，张国焘旧态复萌，继续坚持分裂主义，于 9 月 13 日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并督令红四方面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以实现其到西北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的主张。

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使拥护中央路线的同志难以容忍。9 月 19 日，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联名致电党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同日，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商量态度不便作战。中央当即回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当时，因周恩来准备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中央决定，“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

21 日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向党中央和军委致电：“静会战役计划已收到。我们认为这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的正确决定，而且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我们同意毛、周、彭所提议六个军委主席团组织，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为着配合一、四方面军之行动，我们拟以六军全部开出都宝地区，策应你们，并号召全体庆贺一、二、四方面军之大会合。”

张国焘的出尔反尔，延误了红军的行动，给胡宗南西进提供了时间。9月，胡部4个师从长沙、衡阳乘火车赶到咸阳，10月初，先头10余个团将进至清水、秦安一带与在天水的毛炳文部靠拢，从北面威胁红二方面军；南面，王均的第35旅等部9月底袭占成县，川军孙震部也进到康县一带，使二方面军腹背受敌，有被隔断于西兰大道和渭河以南陷于孤军作战的困境。

10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急电红二方面军“宜乘胡敌尚未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任弼时、贺龙等决定放弃甘南，分左右两纵队，从天水以西北移。这时，蒋介石令胡宗南进占隆德西北的将台堡，准备发起通渭、会静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令红二方面军迅速集中到通渭，在隆（德）静（宁）大道以外和红四方面军一起抗击胡敌。

10月4日，红二方面军主力撤离甘南，向北转移后，右纵队行进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第6师师长张辉阵亡，第6师和第17团失去联系。在康县活动的第17团，因收拢不及，遭到优势敌人的截击包围，全部损失。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同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在会宁以东的青江驿、界石铺会师。9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10日，在会宁城召开了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历尽艰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甘等省，历时1年多的长征。红二方面军在转移中，不顾敌人的前堵后追及敌人骑兵、飞机的袭击，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作战，通过西兰大道，于10月22日在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艰难困苦，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等省，行程2万里，历时近1年的长征。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不仅是红军广大将士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且同党中央和朱德、任弼时等坚决斗争，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密不可分。

红军长征中的女同志有多少

英雄巾帼妙龄芳，着戎装，执长枪，不逊须眉，报国在疆场。为斩绳索求自主，擒虎豹，本娇娘。长征万里路茫茫，顶寒霜，断炊粮，草地荒山，浊水似琼浆。胆壮心红坚铁石，争奋勇，逞刚强。这首江城子词是赞女红军的。那么，当年长征中的女同志到底知多少呢？这是一个不大容易搞清楚的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各部中，都有女同志，且不少人参加了长征。参加长征的妇女究竟有多少？从无精确统计。过去的一般说法，只注意中央红军中的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等20多位。

其实，参加长征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中都有许多女同志，她们主要分布在医疗、机要、司政后机关，还有更多的是在连队。

据1987年甘肃的《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水森的文章称：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至少有18名，她们是李贞、戚元德、陈宗英、蹇先任、周雪林、马忆湘、陈罗英、石芝、杜玉珍、杜永新、陈琼英、曾红林、陈士美、胡自强、张金莲和她的女儿“二妹子”以及老金（名字不详，女红军对她的惯称）。参加红25军长征的至少有7名女战士，她们是：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东屏。

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更多的却是查不到姓名的，尤其是红四方面军中，

妇女不仅是执行战斗勤务，还直接编到战斗连队，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时，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团在 2000 人左右，据红四方面军 1935 年 4—5 月战斗实力统计，共有 5 个军 13 个师 37 个步兵团，2 个妇女独立团和炮兵团与特务团，总计 41 个团，总兵力 10 万人。这样平均每个团有 1500—2000 人。妇女独立团按小团计算，每个团在 1000 人以上，两个团在 2000 人以上。还有妇女工兵营 400 余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不仅在长征中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在缩编以后，以张琴秋为团长的妇女独立团还参加了“西路军”，向新疆进军中，在高台战斗和仉家营子战斗中，与敌骑兵英勇搏斗，在中国妇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红军长征中的若干第一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长征。称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沿途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揭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不仅使许多青壮年毅然参加红军，而且沿途还播下了许多革命的火种。这一壮举堪称世界军事史上之第一。

红军长征中还有许多第一，值得人们纪念、学习。例如：

第一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等指挥的红七军团组成，1934 年 7 月由瑞金出发，10 月到达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组成红十军团，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进至皖、浙、赣边的怀玉山，遭国民党军的“围剿”而遭受严重损失，未能实现北上抗日的决心。剩余部队坚持浙赣边区斗争。

主力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座山，是瑞金的云石山。1934 年 10 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和中央直属队从云石山附近的梅坑出发，开始长征。

第一次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是在江西安远、信丰之间。1934 年 10 月下旬，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在安远、信丰之间布防，堵截红军。红一军团和三军团并肩突击，击破了敌人防线，渡过漳水，向湖南汝城进发。

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已为人们所共识。其次，遵义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一次会议。黎平会议之前还开了一次通道会议，通道会议为黎平会议准备了条件。1934 年 12 月 18 日，黎平会议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可以说，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红军长征中帮助地方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是黔东苗族游击队。1934 年 12 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黔东南后，帮助苗族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苗族游击队。

参加长征的第一位国民党人士，是周素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贵州毕节地区国民党宿老周素园先生热烈拥护中共的抗战救国主张，1936 年 2 月他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甘宁边区。

红军长征中帮助地方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是遵义革命委员会。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结束后，在红军的帮助下，于遵义城东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第一次大仗的胜利，是遵义战役的胜利。1935 年 2 月 26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奇袭娄山关，27 日再占遵义城，经过激战，歼灭黔军

和国民党中央军共 20 个团，这一大捷显示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长征中年龄最大的，是徐特立同志，他 1877 年生，曾在湖南长沙任教，当过毛泽东同志的老师，他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长，长征时 58 岁。其他年长的还有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第一支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是红 25 军。由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 25 军于 1934 年 11 月从河南罗山开始长征，1935 年 9 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 26 军、红 27 军会合，组成红二十五军团，积极寻找、接应中央红军。